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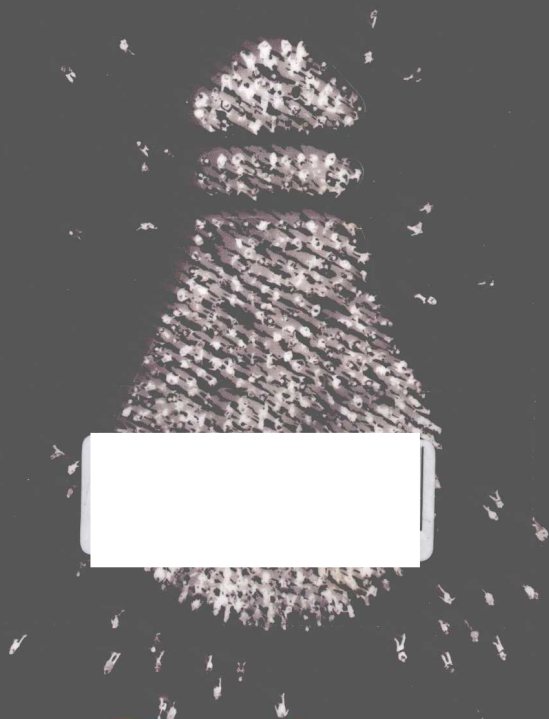
以法文原著为蓝本，最新权威修订版本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张波 杨忠谷 译



The Crowd

120 年来，最经典、最具现实意义的社会心理学巅峰著作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勒庞的这本书是当之无愧的名著，
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

——余英时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
最有影响者，
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

——钱穆

上架建议 ● 社会心理学

ISBN 978-7-5680-0955-3



9 787568 009553 >

定价：22.00 元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张波 杨忠谷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 (法) 勒庞著；张波，杨忠谷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680-0955-3

I. ①乌… II. ①勒… ②张… ③杨… III. ①群众心理学—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3600号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张波 杨忠谷 译

责任编辑：康 艳 沈剑锋

封面设计：天启封排工作室

责任校对：孙 倩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政编码：430074 电话：(027) 81321913 (010) 64155588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5.5

字 数：110千字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 群体心理	1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	3
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13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33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43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49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51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72
第三章 群体领头人及其说服手法	86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108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123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125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129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134
第四章 选民群体	142
第五章 议 会	154

乌合
之众

第一卷
群体心理

第 一 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

提要：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构成/大量个体的聚集不足以构成群体/群体的心理特征/群体中个人思想变化及其个性的消失/群体受客观因素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和体力活动的得失，智力降低和情感变化/群体的情感变化具有两面性，既可优于群体内的个人，也可比其更糟/群体既可英勇无畏，也可易于犯罪。

从通常的角度来看，“群体”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人，不论民族、职业、性别的界限，也不论什么原因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群体”一词的定义却不尽相同。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该特点绝对不同于群体内的个人所具备的特点。只有当他们聚集时，所有人的感情和思想将会统一，个人思想将会消失，从而形成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无疑是暂时的，但它却表现出一些非常明确的特性。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思想状态，我们暂且称之为组织化群体，或称之为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完全受群体精神的统一支配。

不言而喻，就一些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人，仅仅这一个事实，并不能使其获得组织化群体的特性。一千个偶尔在公共场所所聚集的人，如果没有任何明确清晰的目标，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讲，根本不可能算是一个群体。要具备群体的特性，需要有某些前提条件，且我们一定要确定它的性质。

自觉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思想的转变，就是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最为显著的首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是总需要某些人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有时，在某种狂躁的感情下，比如国家大事的影响，为数众多且独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种心理群体的特征。在如此条件下，一段插曲就足以令他们闻风而动，从而马上获得群体所独有的特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成千上万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人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另一方面，虽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集在一起，但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得以形成，它立刻会获得短暂且又十分明确的普遍性特征。除了这些普遍性的特征之外，还会有些其他的附带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织人群的素质不同而各有不同，并且精神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区分。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一个异质性群体（由不同成分组成的集体）会表现出与同质性群体（大体相同的集体，如宗教、等级、阶级组成的集体）相同的特性，除了这些相同的特性之外，它们还具备一些自身的特点，由此将两类群

体进行区别。

在进行深入研究这两类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关注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就像自然科学家一样进行分析和研究，他们总是先描述一个族群的共同特点，然后再研究该族群包罗万象的种类及其有所区分的具体特点。

对群体心理不宜做出准确的描述，因为其组织不但有种族，有构成方式的差异，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性因素，其性质和强度都会有所变化。然而，个人心理学的研究也会发生同样的困难。一个人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实，只有在小说里才会发生。只有环境的单一，才能形成独特性格的单一性。我曾经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环境的突然变化会使这个可能性完全地表现出来。这就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都是原来那些最为谦和的公民。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一些平和善良的官员。风雨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常态，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最恭顺、最听话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层次做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全面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被赋予新的特性，这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就会形成一个清晰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

讲述的群体精神的统一性，其心理学规律才会发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会有一些与孤立的个人心理特征不同，其中有些更是群体所独有，只能在群体中才可以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特征，以便说明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论他们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慧是相同还是不同，他们既然变成了一个群体，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变得与他们独自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动甚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思想或感情因素作用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转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与睿智的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一个组成群体的集体中，并不会简单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形成平均值。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因为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变化的组合，如某些化学元素，经过酸和碱的反应后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它所具有的特性和化合形成它的那些物质完全不同。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有异于独立的个人。要想证明这一点十分容易，但是要找出这种差异的原因却很困难。

要进一步了解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已经确定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存在，而且在其智力活动中也发挥出完全一边倒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下意识相比，有意识只能起微弱的作用。最细致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完全受到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个深层心理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血缘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血性。在我们的行为可以被解释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地隐藏着我们没有可以被解释说明的原因。在这些原因背后，一定还有其他许多我们自己根本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我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藏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行为构成了其种族的先天血性。尤其在这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人与人之间的部分是很相似的，而他们彼此之间有所区别的，主要还是他们性格中的那些有意识的方面。比如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还是因为独一无二的遗传基因。人们在智力上参差不齐，但他们却有着惊人相似的共同本能和感情。在属于感情范畴的每一件事情中，比如宗教、政治、品德、爱恶等，即使最优秀的人士也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就智力而言，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渊之别，但是仅从性格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到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同一种族

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相同的条件下都具备了此特征。我个人认为这些特征，变成了集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从而个性也随之减弱。异性质被同性质吞噬，无意识的个性占据上风。

群体一般只有很平常的品质，这就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事情。但凡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时，都是由社会精英人士组成的议会所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并不会比一群普通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来的平庸才智，来处理现在的工作。群体中叠加在一起的只有愚昧而不是天生的才智。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可能像人们常说的，整个世界要是比伏尔泰更加聪明，倒不如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平常品质集中到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如我们说过的那样，会创造出一些新的特性。这些新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有些不同的因素，对那些为群体所独有、特殊的且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上研究，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来自本能的渴望。但是在一个人时，他又必须对这些欲望和渴望加以收敛。他很难阻止自己不产生这样的歪念：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独自承担罪责。如此一来，总是

约束个人的责任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次，感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很难能解释清楚。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催眠方法来使用，下面我们就对此做出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皆有其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可以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决定群体特点的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我这里指的是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后果。

要想理解这个现象，就必须依靠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如今我们已经明白，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唯诺诺，会做出一些与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行为。最为细致的观察似乎可以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出催眠影响之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它雷同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醉，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任意支配的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随之消失，意志

和辨别能力也不复存在。所有的感情和思想都受催眠师左右。

从总体上来看，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他不再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个被催眠的人一样，自身一些能力遭到了削弱，而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地加强。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无法抵抗的冲动而采取一些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控制，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且使其力量得到增强。而在群体中，具备了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这种暗示的个人凤毛麟角，因此根本无法撼动。他们最多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正因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暴力的恶行。

如今我们可以知道，有意识人格的消亡，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面，以及马上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准则，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他已经不再是自己，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身意志支配的傀儡。

深一层来说，仅仅就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涵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而已。他表现出身不由己，狂热而残暴，也表现出原始人的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

已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感染。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他会无意识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行为。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可以被风刮到任何地方。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裁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案。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文雅的良好公民，但是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议案，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死刑台，并且一反自身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容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分别，甚至在完全失去自主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吝啬鬼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忠实的信徒，把本分的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英雄。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法国的贵族一时慷慨激昂，决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自身的权利，是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独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动的行为这个方面来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完全是环境的问题，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的角度来

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素。群体通常是犯罪的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从容就义，为一种精神或观念的成功提供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像十字军东征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改变了历史。假如人们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法创造历史，那么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故事了。

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提要：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 / 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作现实/为何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实例/史学著作的价值微乎其微。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它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感情的缘由/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他们的极端保守/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5.群体的道德。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或低劣/解释与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左右/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一、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在概括了群体的显著特点后，依然要对其特点进行细分研究。可以指出，群体的一些特点，比如急躁、冲动、缺乏判断力和批判精神、感情夸张等方面，在低级进化的生命中几乎一

直可以看到，比如妇女、蒙昧的野蛮人和儿童。但是这一点我只是顺带提一下，再说，这对于熟悉这类愚昧人的心理研究者并没什么用处，也很难让对此事完全不了解的人相信。现在我就按照次序讨论一下可以在大多数群体中观察到的不同特点。

1. 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提到过，它基本上完全被无意识动机控制。它的行为基本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控制。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惊人地相似。就其表现而言，他们的行动可以很出色，然而这些行为并不受大脑控制，个人行为是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来决定自己行为的。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起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傀儡。孤立的个人就像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受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向他发出危险的信号，即受冲动的摆布是错误的，因此他会约束自己不受其摆布。这个道理可以用心理学语言表述如下：**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依据让群体产生兴奋的原因，它们所产生的各种冲动可以豪放或者残忍，勇敢或者怯懦，可是这些冲动总是表现得异常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要保全生命的本能，也极难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种类繁多，群体总是屈服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种多样。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可以

在瞬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般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可以为了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尸横遍野。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它们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威名远播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鼓动到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自己。

因此，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准备。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性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狂风卷起的树叶，向着四面八方飞舞，然后又飘落在地上。下面我们研究革命群体时，会举出一些验证他们感情多变的事例。

群体的易变性使得它们难以捉摸，当权力落到它们手里时更是变本加厉。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无形的约束，民主就几乎不可能持续下去。另外，群体虽然有着各种疯狂的意愿，它们却不能长久。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未雨绸缪的思考与准备。

群体不仅仅是冲动而多变的，就跟野蛮人一样，它不认同在自身的意愿和这种意愿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问题，它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性问题，因为数量上的众多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因此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孤立的个人很明白，当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

殿宇或是打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打消这种念头。但是在成为群体中之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多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越货的邪念，并且会立刻付诸行动。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无情地摧毁。人类的肌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冲动，可以说，意愿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的状态。

我们产生一切情感来源于种族的基本特性，它也总是会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像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一切普通感情。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且冲动的，但程度却不尽相同。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格兰人的群体就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最近法国历史中的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深刻的说明。二十五年前，一封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了侮辱的电报被公开，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关于某个问题的一次无关痛痒的电文，再次激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了一次十分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轻微的抵触，甚至内阁大臣都未引咎辞职。任何地方的群体都带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则更为突出，但凡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立刻会发生改变。这样做，便如同是在悬崖上散步，不定哪天必会跌入深渊而粉身碎骨。

二、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曾经在诠释群体时讲过，它的一个最普遍的特征是极

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情况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迅速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是多么无关痛痒，群体通常处在一种渴望被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思想，群体感情的一致性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定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行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转变为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皇宫还是自我毁灭，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由刺激的性质来决定，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受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联系支配，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动大相径庭。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范围中，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冲动，导致它们失去了一切判断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谣言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迷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恶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支离破碎。群体是用形象来思考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可以

想一想，有时我们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能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熟视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别。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形象也当作了现实，尽管这个形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无足轻重的关系。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曲解的方法，既多且杂，不尽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想法。可是情况又并非如此。因为相互传染，受到的曲解是相同的，因此在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的状态都是一样的。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曲解，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开始。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会第一个感觉到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某个人捏造的奇迹，马上就会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这种集体混乱的事件，而且是历来如此。这种混乱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就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这种品质毫无意义。从他们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开始，博学之人便和白痴一样失去了观察能力。

似乎这个观点有点说不太通。若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好几本书，也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些没有得到证实的观点。因此我要为它举出几个例子，它们都是从无数事例中随机挑出来的。

下面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它选自使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博学的。一名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然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过去也引用过。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大海上巡逻，寻找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风和日丽的晌午，值勤哨兵突然看见一艘遇难船只。船员们朝着信号提示的方向看去，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一条载满人的木筏被遇难船只拖运着。但这不过是一种集体性的海市蜃楼般的感觉。德斯弗斯司令官放下救生艇前去营救遇难者。当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可是在到达目标后，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找到的不过是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既定的事实面前，幻觉就此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里，可以明确地看到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

觉的效果。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期待中观望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当时的全体官兵接受。就此，眼前发生的事情被曲解，真相被幻觉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需要太多人。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集体，就算他们全都学识渊博，但在他们的特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个人观察力和批判意识立刻就会消失。

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达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聚集在一块，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让他们观察物体并且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特殊标记后，达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了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全过程，并让他们做了记录。这些杰出观察者们得到的报告居然全都同意，并且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来自超自然的方式。达维先生向他们遗憾地表示，这不过是简单的幻术。“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特点”，这份文献说，“不是幻术的奇妙，而是外行所提供的论断的虚假”。达维先生说，“显然，甚至众多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谬误的条件关系，结论是假如他们的结论一旦被认定是准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简单的幻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很简单，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会感到诧异。可是

他所具有的支配群体意识的能力让他们信服，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好像是被催眠师催眠的情况。可见，对于行为非常谨慎，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因此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便轻而易举，也就不奇怪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笔下这些文字中，以及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事情。五六个目击者言辞恳切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铁证如山，不容置疑，于是法官签署了死亡证明。然而就当大家为这两个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实摆在了面前，原本以为死去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就像前面提到的事实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初大多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以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假如第一个观察者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的一些特征，譬如一块伤疤，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影响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尸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

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有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却弄错了。然后其他人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同学们辨认尸体的次日，一个妇女突然喊道：“上帝呀，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察看了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疤痕。“这绝对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走而杀害的。”

这个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找来。当问到他时，他回答道：“那是小菲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个孩子是菲利贝·夏凡德雷，其中有个人是孩子的同学，他判断的依据是孩子尸体上佩带的一枚徽章。

可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夏凡德雷全都弄错了。六周后，那孩子尸体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可以指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应该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因为她们最没有主见。这种误认向我们证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不会有任何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对他们的证词当真。高官们惯于说童言无忌。然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知识基础，也会知道事情往往相反，孩子们一直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

但依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儿童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得更为妥当。

让我们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结论就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中影响着集体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可以证明，应当明确地认为群体的证词很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色当一战，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冲锋，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的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一本书中指出，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事实错误，尽管这是一些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类事情向我们证实了群体的证词价值。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可以用来作为支撑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然而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逻辑学的文章需要重新来过。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这通常也就是在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有着千差万别。

综上所述，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意淫的产物，因为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想象，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度光阴。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

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载吗？我们连一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可悲的是，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案，可它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慈爱仁慈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如来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也无多少共同之处。

英雄的故事因为群体的想象力而发生改变，就算英雄离我们而去，也无须数百年的过程，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间。我们在当下便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神话，在不到五十年便改变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诗人眼中，他依然会长期留存在乡村民众的记忆里。三十年后，这个举止从容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滥杀无辜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便让三百万人一命呜呼。如今这个神话又在变化。可以想象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前后矛盾的记载，也许会怀疑是否真正出现过这位英雄，正如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迦牟尼的存在一样。从他身上，他

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传说或一个赫拉克利特式的传奇故事的演化过程。对这种缺乏确定说法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泰然处之，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征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功能。

三、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好坏，其特点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做出准确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过渡。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外一个事实的影响，不论任何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地传播，那么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简单和夸张的群体情绪所产生的后果是，它居然全然不知道怀疑或者不确定是怎么回事。它就像女人一样，瞬间便会走向极端。怀疑一旦产生，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能量，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马上变得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暴躁，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又会因责任感的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人数越多，这一点便越容易肯定，因为人数众多而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孤立的个人所不可能产生的情绪和行为。在群体中间，傻

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软弱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激烈、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群体的这种倾向极其可悲的是，时常影响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糟粕，孤立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就不得不对它们有所限制。因此群体很容易干出最可恶的卑鄙勾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在微妙的影响之下，不会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中来。

群体夸张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思想左右。渴望打动群众的演说家，就必须语出惊人，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所习惯的技巧。

深一层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举动。英雄表现出的优良品质和美德，总是会被群体渲染夸张。早就有人明智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备的勇气、道德和坚毅品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独特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它的特殊性。这种立场绝对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在逻辑上其实毫无相同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必然需要品味低下，

然而这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老板在接受一部戏时，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作出判断，他们必须要把自己变成观众。

这里我们再次进行深入的解释。我们会说明压倒性影响的种族因素。一部在某国引发万人空巷的歌剧，在另一国却未获得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常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继续补充，群体中的夸张倾向只会对情绪发生作用，对智力完全起不到任何影响。我已经说明，个人一旦加入到群体之中，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一位有学识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仅仅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境界。

四、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发泄极端而简单的情绪；向他们提供的各种意见和信念，他们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错误。用暗示的办法进行引导而不是做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历来都是如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

对何为真理、何是谬误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并进行研究探讨，而群体却是绝对不

会允许的。在集会上，哪怕做出最微弱反驳的演讲者，也会马上招来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喝倒彩声中，演讲者就此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掌权的代表人物对这种谩骂进行约束，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就是专横和偏执，可是其强度却各有不同。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在这个方面会一再表现出来。尤其在拉丁民族群体中，可以看到专横和偏执能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的群体发展中，已经完全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的那种强烈的独立的个人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必须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的信念。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裁判所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派，对自由从未能给出另一种理解。

专横和偏执使群体有着清晰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风点火，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施。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慈悲心肠所动，因为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形式温和的主人，而是只向残酷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给这种人树起最雄伟的雕像。当然，他们喜欢践踏被剥夺了权力的暴君，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布衣。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

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者，对强权便会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有时无，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影响，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可是，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于支配地位，那就是对它们心态的完全误解。在这件事上让我们误会的，只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冲动。他们的破坏和反叛行为的爆发总是一瞬间而已，群体总是受到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世俗的等级观念，难免保守。对他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烦，本能地变成傀儡。当拿破仑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心有余悸之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倔强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考虑群体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问题，尤其是那些心潮澎湃的民众革命行为。不错，他们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改变命运的契机，他们有时甚至发动暴力革命，然而这些旧有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它们绝对可以得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性，只会影响到表面。其实他们就像野蛮人一样，有着固执的保守本能。他们虔诚地对一切传统迷恋和崇拜；他们对一切试图可能改变自身基本生活方式的新事物，有着无以复加的无意识的恐惧。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

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也不可能实现，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工业革命出现以后，群体才开始掌握权力。

五、群体的道德

假如“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社会习俗，不断抑制内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成“道德”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在经常看到这种行为发生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微。当然，这是一直会存在的情况。但又是为什么呢？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所继承的野蛮破坏本能，它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遭到惩罚，于是就彻底放纵起来。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本能，便把它一股脑儿地发泄在其他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动物，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

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所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群体可以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唯有集体才能够表现出伟大的献身精神，只有为集体才能不计名利。群体为了自己只知之甚少的观念及只言片语，便英勇地慷慨赴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不断示威的人群，极有可能是为了服从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微薄的工资。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动力。在群体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统治着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情愿自己任人杀戮，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鸟儿一般。

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混蛋中间，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把他们的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的。1848年的欧洲革命时期，在占领杜伊勒里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染指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面包。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一定不是一种永恒的常

规，然而它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严重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夸张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道貌岸然。狂放不羁的人、皮条客和粗鲁的人，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经常会一下子变得轻声细语，虽然与他们习惯了的谈话方式相比，这种场合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群体经常放纵自己的低劣本能，但他们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的典范。如果顺从、不计名利和彻底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这些都可姑且算做一种美德的话，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准，就连最聪明的哲学家也望尘莫及。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苛求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就根本不会长出自己的文明，人类也不会再有自己的历史。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提要：1.群体的观念。基本观念和次要观念/相互矛盾的观念为何能够并存/高深的观念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被群众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无关。2.群体的理性。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它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3.群体的想象力。群体有着强大的想象力/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群体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的想象力是政客的权力基础/能够以事实触发群体想象力的方式。

一、群体的观念

我们在前一部著作中^[1]讨论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得到革新。我们说明了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是多么意义深远，影响这一过程是多么艰难，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得到

[1] 《民族心理学》。

落实后所具有的力量。最后我们又说，历史大动荡就是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果。

我们已经用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不想重复。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个问题，以及他们领会这些观念的形式。

这些观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因为被困于一时环境的影响而来去匆匆的观念，例如那些只会让个人或某种理论着迷的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因为环境、家族遗传规律和大众意见而具有的稳定性。过去的宗教观念，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属于这类观念。如今被我们的父辈当成人生支柱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即将支离破碎。它们的稳定性已消失，同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国家制度也受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每天都在形成大量的观念，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那些观念不过是昙花一现，看来它们很少具有生命力并且很少能发挥持久的影响力。

无论给群体提供的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权威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发生作用。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靠这种外衣，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相似或连续的逻辑性，它们可以互相转换，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随机取出的幻灯片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看到最矛盾的观念能够同时在群体中盛行。随着时机不同，群体会处理在它的理解力所能及的不同观念中的

某一种的影响下，而干出迥然不同的事情。群体完全没有批判精神，因此也就感觉不到这些矛盾的存在。

这并不是群体所独有的现象。孤立的个人，不仅仅是野蛮人，还包括在智力的某些方面接近于原始的所有人，如狂热的宗教信徒，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奇怪现象。我曾看到，在欧洲大学里受到良好教育并拿到文凭的印度人，就匪夷所思地表现出这种现象。某些西方的观念被附着在他们一成不变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不同的场合，这一面或那一面的观念就会表现出来，并伴之以相应的言谈举止，这会让同一个人给人的感觉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其说是矛盾，还不如说只是一种表象而已。因为只有代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标准。只有当一个人因为不同种族的通婚而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之间时，他的行为才会经常表现得截然对立。这些现象虽然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这里为它们纠结并无任何好处。我的意见是，要想充分地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周游世界进行观察才有可能。

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容易被群体接受，因此它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变革，才能变得通俗易懂。当我们面对的是有些生涩难懂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尤其会看到，为了适应群体低微的智力水平，对它们需要进行多么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取决于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特性，不过一般都呈现出观念低俗化和简单化的趋势。这解释了一个事实，即

从社会角度来看，现实中很少存在观念的等级性，也就是说，很少存在尊卑之分的观念。这种观念，不管它刚开始出现时有多么伟大或正确，它包含的那些高深或博大的学问，仅仅因为它进入了群体的智力范围并对他们产生影响，进而便会被消灭殆尽。

不过，从社会的方向看，一种观念的核心价值——它的固有价值并不重要——必须考虑的是它所产生的显著效果。基督教信仰，民主信仰，或社会主义信仰，都算不上十分高明。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它们只能算是一些令人扼腕的错误，但是它们的威力却十分强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发展方向的最基本因素。

当一种观念经过彻底变革，使群体能够接受时，它也唯有进入一种无意识状态，变成一种情感，这需要漫长的时间才会发生作用，其中涉及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予以研究。

千万不要以为，仅仅因为观念正确，便至少能在上层人的头脑中产生影响。只要看一下最确凿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是那样地无足轻重，便会立刻搞清楚这个事实。十分明显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接受，但是人们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自我重新带回到他原先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过不了几天他便会重回原样，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实际上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束缚之下，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只有这种观念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最隐蔽的动机。群体中的情

况也不例外。

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深入到群体的思想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作用后，和它对抗已经毫无意义。导致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思想，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最终深入人心。一旦它们变得坚不可摧，其无坚不摧的威力便路人皆知。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而做出的不懈追求，使得整个王室土崩瓦解，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之中。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内乱不已，欧洲出现了甚至连成吉思汗看了也会胆战心惊的大屠杀。世界还从未见过因为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悲剧性后果。

观念在群众的思想中扎根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根除它们需要的时间更不会短暂。就观念而言，群体观念总是比博学之士和哲学家落后好几代人之远。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唯有根据自己已经不再信任的真理中的原则性进行统治。

二、群体的理性

不能完全地讲，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但是它所接受的理念，以及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理念，从逻辑上讲，属于十分拙劣的一种，因此把它们称为推理，只能算是一种比喻。

像高级推理一样，群体的低劣推理也要借助理念的力量。

不过，在群体所采用的各种理念之间，只存在表面的连续性和相似性。群体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他们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消融，于是认为同样是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他们又像一些野蛮人那样，以为只要吃下强悍敌人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量；或是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立刻便认为天下所有的雇主都是剥削他们的人。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懂得如何去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结论。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唯一论证，其中包括一系列环节的逻辑论证，这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不能理解的，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研究某些演说词，其中的漏洞经常让人感到吃惊，但是它们对听众却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人们忘记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说服群众的。同群众有密切交往的演讲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只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虽然二十本长篇大论都是认真思考后的产物，但还不如几句有说服力或者号召力的话管用。

没有必要再一次指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评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

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被采纳的结论。在这方面，也有无数的个人与群体水平相比，其实也不见得高明多少。有些粗浅的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普遍的赞同，更多的是因为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独特的意见。

三、群体的想象力

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正如缺乏推理能力的人那样，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异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们头脑中形成的影像，全都栩栩如生。从某种意义上讲，群体就像个睡梦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冻结，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影像，但是只要他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迅速消失。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他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他们也认为最不可能的事就是最令人吃惊的事。一个事件的不寻常且传奇式的一面会给群体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分析一种文明就会发现，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正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从历史上看，**表象总是比真相产生更重要的影响，不现实的因素也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也只能被表面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他们的行为动机。

因此，最能生动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总是对群体有巨大的影响。在古罗马群众的眼里，面包和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想象，他们已无其他要求。在此后的所有时代里，这

种想象很少改变。对各种群体的想象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的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会着同样的感情，这些感情没有马上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视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和泪，都是为了那个想象出来的动人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所起的作用一样，他们倾向于变成行动。这类故事我们经常听到：大众剧场的老板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迷的戏，便不得不在扮演坏人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以免受到那些对坏人愤怒而义愤填膺的观众的恶毒攻击，尽管那罪行不过是想象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群体心理状态，尤其是对其施加影响的技巧之最显著的表现。虚幻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几乎像现实一样大。他们有着对双方不加区分的明显的心理学行为倾向。

入侵者的欲望和国家的权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上。在指挥群体时，更要在这种想象力上下足功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本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

此外，所有时代和国家的伟大统治者，包括最独裁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其权力来源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其统治。拿破仑对议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战争；通过变成伊斯兰教徒，在埃及站

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犹太人的国家，我也许会重修所罗门王的神庙。”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以来，大概从没有一个伟大的统治者能像拿破仑一样更好地了解怎样才能影响群众的想象力。他始终关注的事情，就是对这种想象力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在胜利、屠杀，或者在演讲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仍然对此不能忘怀。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要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能采用论证的方式。安东尼^[1]让民众反对刺杀恺撒的人，使用的方式并不是滔滔雄辩，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只是用手指了指恺撒的尸体。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因素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是以几个不同寻常或奇妙的事实来说明。与之有关的事例是一个杰出的大胜利或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而不宣。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象力，而一桩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有多么的微不

[1] 古罗马帝国统帅，后与屋大维交恶，兵败自杀。

足道。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五百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象力完全没有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发布出来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五百人而不是五千人，但它如果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社会大众的面前，就是一次极其令人瞩目的事件，譬如说埃菲尔铁塔的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因为得不到消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客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象力的影响持续了整整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八百五十条船和二百零三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言，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兴趣去关心这些一直在发生着的事。**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人注意的形式。**如果让我发表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控了影响群众的想象力，也就掌控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情感的意义/它不取决于对某个神明的崇拜/它的特点/信念的强大是因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例子/民众心目中的上帝从未消失/宗教情感复活所采取的新形式 / 宗教形式的无神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并不需要进行推理，它对观念要么是完全接受，要么是完全拒绝；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全盘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倾向于立刻转变成行动。我们还证明，对群体施加适当的影响，它就会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从容就义。我们也看到，它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也几乎立刻会变为仇恨。这些一般性解释，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群体信念的性质。

在对这些信念做更为细致的研究时，我们还会发现，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在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譬如上个世纪的混乱，他们总是采取一种独特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称为宗教情绪之外，没有更好的称呼了。

这种感情有着非常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象中某个显赫人物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屈服，盲目服从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研究，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都倾向于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虚无缥缈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质雕像，还是某个英雄人物或政治观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点，便总是有着宗教性的本质。由此可见，它还会在同等程度上表现出超自然和神秘的情况。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胜的领袖。

人如果只崇拜某种信仰，他还算不上是虔诚的信徒，只有把他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资源、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内心的热情，全部奉献给一种事业或一个人时，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成为唯一的准则后，才能说明他是个虔诚的人。

固执和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因素。但凡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当聚集在一起受到某种信仰激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点。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裁判所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固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性的因素。受到某个集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拿破仑当了十五年这样的神，一个

比任何神明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但凡宗教或政治信念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让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渴望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崇拜的偶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在任何时代从不例外。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正确地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热爱之情。他准确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被厌恶的统治形式，竟维系将近五个世纪，世界史上还不曾有过类似的情况……帝国的区区三十个军团，如何能让一亿人俯首称臣，这真是匪夷所思。”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设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每个角落，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每座城市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祭司由统一的高卢臣民选出，他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不可能全都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

希腊和亚洲。”

大多数统治者，如今已经不再设圣坛祭祀，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拥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代统治者所得到的相比并没有多少差别。只要深入研究一下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即可破解历史的全部奥妙。**群众不管需要什么，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神。**

切莫以为，这些事情不过是过去时代的神话传说，早已被理性肃清。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下，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情感。群众已经听不到神明或宗教这种词眼，以往正是以它们的名义让群众长期受到压迫。但是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明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近年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间酒馆里，都会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正义铲除邪恶的权力，成千上万的人甘愿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与他传奇般的名望不相上下，他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位置。

由此判定，断言群众需要宗教，实在是十分无用的废话，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借用宗教的形式，即能够将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信仰。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例子。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

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者，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很快也会适用于实证主义者。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他吹灭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先生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事物，然后他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由此，他宗教信仰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然而我们真的能说他的宗教感情也变了吗？

我要再说一遍，除了我们研究群体信念时长期采取的宗教形式，便不可能正确理解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探讨，需要我们从心理学角度着眼，而不是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根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嗜血、混乱和凶残的一面让他感到惊恐，但是他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癫狂的野蛮人在肆意妄为，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杀戮，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大屠杀^[1]和法国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恐怖统治，都是同类

[1] 是法国天主教暴徒对国内新教徒胡格诺派的恐怖暴行，开始于1572年8月24日，并持续了几个月。

事物，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裁判所的办法，是一切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办法。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思想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是最绝对的独裁者也无法造成这种事件。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惨案是一个国王的所作所为时，他们对群体心理表现得和统治者一样无能。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思想来贯彻。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圣巴托洛缪惨案或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领导者们的责任，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1]。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总可以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思想的作用。

[1] 罗伯斯庇尔、丹东、圣鞠斯特，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要员。

乌合
之众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提要：群体信念的准备性因素。（1）种族。它的影响起到重要作用。（2）传统。它概括性地反映种族精神/成规的社会意义/它在失去决定性后会成为不利因素/群体是传统的忠实支持者和拥趸者。（3）时间。它形成信念，也可使信念在不知不觉中崩塌/在时间的影响下从混乱向条理过渡。（4）政治与国家制度。不正确的观点/它们产生的作用力是微乎其微的/对于各个民族来说，要想选择自己认为完美的制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一个制度下蕴含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内容/也许有些制度在理论上并不完美，但对个别民族却是很有必要的。（5）教育。关于教育能够影响老百姓的认识/统计学上的概念/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在道德滑坡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民族所发生的案例。

在分析完群体的整体心理构成后，我们知道了与之相关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分析一下它的意见与信念的形成过程与形成方式。

对这些意见和信念起关键作用的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种类型的因素，它能够使群体认同并坚持某种信念，并使之将这种信念坚持到底，轻易不会改变。这些因素为下列情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一些威慑力与结局都令人惊讶和不安的新的思想都会在触不及防中闪现出来，即使它们的非组织性和自觉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些思想的突然出现并得以实践，很多时候速度显得非常快。但这只是浮在水面的薄冰而已，在这层薄冰之下一定会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厚重的基础性的强劲力量。

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种类型的因素，随着以上所说的长期性的前期基础工作的延伸，它们便成为实际意义上说服群体的能量。但是，如果没有那种准备，它便不会起到实际的作用。因此，它们是使内心理念采取某种方式并使它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群体毫无征兆地开始加以执行的决定，便是这种类型的直接因素的产物。动乱的突然发生，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老百姓赋予某人权力推翻政权，都能将原因归之于这种类型因素。

这两种因素相继起到的作用，都可以在所有历史大事件中发现一些痕迹。下面仅以一个令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间接因素有哲学家的论著、贵族等既得利益者的横征暴敛，以及民众的觉醒和思想的不断进步。有了这些前提，群众的头脑就轻易地被演说家慷慨激昂的演说，以及朝廷用敷衍性改良进行的反抗触怒。

有些间接性因素有广泛适用性，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它们是群体所有思想观念和内心想法这座大厦的基石。这些因素包括种族、传统、时间、法令法规和教育等。

现在，我们来深入地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类型的因素所产生的有利和不利的影

（1）种族

种族因素应该放在第一这个重要位置，这是基于它本身远超其他因素的重要性而确定的。在之前的一本书中，我曾对它做过深入细致的探究，此处不再赘述。在之前的一本著作^[1]中，我们明确指出了在一个种族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以及它自己的专有特点一经形成后，因为基于遗传规律的原因，它便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力量，且贯穿于它始终的信仰、制度和艺术之中，等等，总之，种族文明中的所有构成，都只是它内在涵养、深入骨髓的精神的外在表现。在从一个种族传播给另一种族时，没有任何要素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这种种族的力量特点是必须予以肯定的。

社会的暗示性因素只能代表一时，并不能长久。它们也许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旦与种族的暗示因素相违背，换句话说，如果它与一个种族从未中断过的天然因素不相协调或者相违背，那它便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能产生长久

[1] 《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

持续的作用。

在本书以后的一些内容中，还会偶尔提及种族的影响，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影响是那样的强大，根本不容忽视，它对群体气质、品质的特征起到决定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强大会使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群体表现出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同甚至相反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2）传统

传统代表着一个种族曾经的理念、欲望和情感，及其表达方式。这种传统是种族综合作用后产生的结果，并且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很大程度上受到它的浸染。

过去的时间对所有生物的进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胚胎学已经证明了的。这一观点为胚胎学证明后，生物科学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假如这一理论能为更多的人所知道，历史科学一定也会产生相类似的变化。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为人们所知晓。相较于上个世纪的学者，许多政客却依然愚不可及，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地相信社会能够和自己的过去断绝关系，完全遵照所谓的理性之光所指明的不二法门前进。

种族是在人类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在各方面有机结合的整体，因此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性累积过程潜移默化，这是所有机体都必须经历的历史状态。

传统是支配人们的主要因素，当群体形成时，就更是这

样。虽然传统有时候很轻易地被人们改变，但正如我经常强调的那样，都只是改变了一些符号和表象而已，并不能触及其本质。

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这种状况而感到不安。因为断绝了与传统的天然联系，一个种族的气质和文明，都可能不会存在。因此有两大关切与人类与生俱来，一是构建某种曾经的结构形式，二是当某种有好处的成就显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会极力地去摧毁这种传统模式。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对传统进行破坏，文明的进步也是不会发生的。故此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个相当严重的困难：怎样权衡稳定与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假如一个种族使其传统坚不可摧，便不会有多大的变化，这和中国一样，缺少改进、创新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爆发动乱也收效甚微，因为它不会产生新的好的结果，或者是被砸碎的禁锢又硬拼在一起，让过去的腐朽再现，或者是让被摧毁的事物自生自灭，颓废败落被无组织、无政府的状态替代。

所以，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最完美的状态是保留曾经的制度，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加以改进。当然，这是个不容易实现的梦想。好像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才有这种强大的能力。

因循守旧，死守传统不放，坚决地反对变革传统思想的，正是群体，尤其是一些有地产的既得利益群体。我一如既往地

认为群体是保守主义精神的忠实信奉者，并且认为，最疯狂的反叛最终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丝毫实际的改变。上个世纪末，宗教场所或拆或毁，宗教人员或是被赶出国门，或是被残害致死，人们或许认为，传统的宗教观念已经丧失了其应有的威力。但是不到几年的时间，为了满足民众的要求，一度遭到禁止的公开礼拜制度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一时被破坏的旧传统，又回到了往日。

没有一个事例能够较好地反映传统对群体心态的威力。最受信任的模范人物，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宦，也不是皇宫中最专横的统治者，因为他们很快就会灰飞烟灭。对我们的灵魂起到支配作用的，是那些在生活中无法看见的主宰，对于一切反叛，它能够轻易地规避而安全着陆，它只能在数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慢慢地消磨。

（3）时间

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和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具力量的因素之一。它是真正的创造者，也是强大的毁灭者，而且这种创造和毁灭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积微尘以成泰山之高，靠的是时间，从微小的细胞到人类这类高等动物繁衍生息，同样靠的是时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作用力足可使所有固有的存在发生改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假设蚂蚁有足够的时间，它一定能将任何一座高山夷为平地。如果世间有可以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并且为某人所

掌握，那么这个人便获得了如上帝般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信徒们的顶礼膜拜。

当然，在这里，我们只研究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和信念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某些非常重要的条件，比如种族，均要受它掌控，缺少它，形成的过程便会受阻。它支配着所有信仰的产生、成长和灭亡。时间使它们获得力量，也使它们失去力量，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具体说来，群体的信念和意见完全是由时间来装备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的生长准备了土壤。一种思想可以适应于一个时期，在另一个时期便会水土不服，病因便在于此。时间就像废品回收站，把各种零碎的信仰和思想收集在一起，经过加工，为某个时期能够产出它的思想提供准备资料。某个时代的观念的产生不是全凭运气随意出现的，它们都从过去的土壤中吸取养分，等到春华秋实，一切都是时间在为它们做准备。如果想知道它们的源头，就一定要回过头去看一看曾经的脚步。它们既是传统的孩子，又是将来的母亲，但永远要被时间奴役。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依靠的主人，为了使所有事物均有所变化，必须允许它自由地发挥作用。今天，面对群体的一些令人害怕的欲望以及它所给出的摧毁和动乱的先兆，我们感到非常恐惧。要想一切事件都能平稳地过渡，若不依靠

时间，恐怕难以实现。拉维斯先生所言非常有道理：“没有任何一种管理的形式可以在瞬间构建起来。政治和各种社会组织都是经过了数百年时间的洗礼才产生的。封建制度也是在经历了数百年杂乱无章的混乱之后才制定出它的法律制度的。不容置疑的君主独裁同样是在经历了数百年后，才发现了控制国家的制度。然而，漫长的无作为的时期是那样地狂热和不安。”

（4）政治与国家制度

良好的制度能够纠正社会的不足之处，一个国家要进步，就必须对制度与统治进行改良；革命的实现一定要借助于强制的指令——这是一些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开始，目前的各种社会学说也依然以此为基础。

即使最有连续性的经验一直都没能纠正这一错误的见解。哲学家和史学家殚精竭虑地想证明它的荒谬，但都没能实现。但是他们在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结果，而观念、感情和习俗不会因为法典的改写而被一起改写时，却不费吹灰之力。一个民族没有能力随便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不能为自己所选择一样。**制度和统治机构都是因为种族而产生，它们不能创造某个时代，而是时代的产物。**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以一时的奇思怪想为根据，而是该民族特征注定了他们要处于受制的地位。建立任何一种政治上

的制度都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要使之发生改变并走向成熟也同样如此。对于任何一种制度来说，并无优劣之分，它们的优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时间内对一个民族大有裨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而言也许是灾难性的。

具体说来，一个民族缺少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不用怀疑，暴力革命只能够改变它的名称，却不能改变其本质。这些名称就和人的名字一样，不过是些没有多大实际用途的标识而已，当探究到历史事物的深层时，根本不会在意它们。因此，英国这个堪称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仍然幸福地生活在君主制的政治制度之下，而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具有强大压迫性的专政，却存在于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国家，哪怕这些国家都制定了共和制的宪法。因此，对一个民族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政府，而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性格。我曾在之前的书中，提出了典型事例并证明了这一观点。

所以，不必将时间浪费在复制各种矫揉造作的法律条文上，否则就如同幼儿园的孩子玩过家家一般，天真得要命，它们只是一堆用文字堆积起来的无用劳动的结果。安全性和时间担负着完备宪政的责任，我们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让这两个因素自由地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的办法，正如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1]告诉我们的一样，那些拉丁

[1] 麦考利（1800—1859），英国著名学者，著有《英国史》。

民族的各国政客们，应当低下头颅，像小学生一样虚心地学习这种方法。他认为，法律所能得到的所有好处，从纯粹理性的方面来看，会表现出一片可笑的荒谬与巨大的矛盾。他后来又比较了拉丁民族一时头脑发热制定出来的宪法与英国宪法，最后得出结论，对后者产生潜移默化作用的不是来自于偶然性，也不是一群人想当然的推理。

根本不去担心谨慎与否，只担心它用起来是否便利；根本不会以不协调为借口去消除这种不协调；只有在感到非常不满意时，才肯进行改变；只有当这种不满意到了无法消除时才肯革命，否则依旧高枕如故；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才会制定更加细致的制度，否则想要针对任何更大范围制定新的制度是不可能的——这些原则，一直淡定而固执地支配着约翰国王时代及其之后的两百五十年的议会。

如果要想说明各民族的法令典章在怎样的范围内代表着每个民族的需求，对其进行简单的革新是没有效果的，只要对它们进行一一纠察就可以。例如，要说明集权制的优缺点，可以只在哲学上进行严谨的分析。但是，当一个民族组成结构复杂的且国民花费了十个世纪的时间来维护这种独裁的统治；当一场以消灭曾经的一切制度为使命的大革命也迫不得已要承认这种专制独裁，甚至还加强了这一制度，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之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的产生源自于一个民族的急切的刚性需求，不得不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必要条件。对某些妄言毁掉这一制度的政客们，我们只能为他们拥有的低智商而感到遗憾。假如他们幸运地成就了这件事，这种成功一定预示着一场残酷的内战即将爆发，这只能带来一种较之于旧政权而更加可怕的新的集权制度。

综上所述，对群体性格产生深刻影响的手段，绝不能在制度中寻找。有些国家，比如制定了民主制度后获得高速发展的美国，而由西班牙人建立的共和国，虽然制度大同小异，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之中，生活状态截然相反。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强大与繁荣以及另一个民族的落后不堪，都与**制度无关**。因为，掌控各民族的是其本身的秉性，凡与其秉性相悖的任何东西，都只不过是从小人那儿借来的一双鞋，未必合脚，只能暂时护体，穿久了肯定难以行走。毫无疑问，一直都在发生因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并且还会继续发生。信徒们就像对待佛牙舍利一般看待这些制度，并赋予这些制度无所不能的超能力。因此，可以说，某些大动乱的爆发是制度刺激群体的神经后所得到的结果。然而，其实以某种方式产生的反作用力，并不是制度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本身是缺少那种力量的，所以不管成功与否，它们本身的确没有借助于这种方式来形成反向的作用力。因此，

对群众的头脑起到影响作用的是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和辞令，尤其是词语，它们既强大又荒诞可笑。

（5）教育

在目前这个时代的主流观点中，这样一种观点理所当然地成为首要攻击的对象，即认为教育具有改造人的强大威力，能够完美地改变人们，甚至能够使他们在社会上获得平等的对待。这种主张被反复宣传、吹嘘，最终成为了牢不可破、深入人心的科学信条。如今，要想征服这种主张，其艰难程度无异于过去抨击教会。

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讨论结果有着相当大的迥异。许多研究哲学的学者和赫伯特·斯宾塞一样，已经轻易地得出了结论：教育既不能使人的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也不会使更多的幸福降临到受教育者的头上；它既无法使其本性发生改变，也不能使其改变与生俱来的激情，而且有时在不良信息的引导下，只会使人走向歧途。研究统计学的人们已经从诸多方面佐证了这一主张，他们指出，随着教育或者说某种教育的普及率提高，犯罪率也会随之提高，社会上某些最坏的犯罪分子，曾经在学校里也是佼佼者。阿道夫·吉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官员，他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如今受教育的罪犯人数是文盲罪犯人数的三倍多，每十万居民中的罪犯人数为五百五十二人，相较于半个世纪前的二百二十七人增加了三百二十五人。研究者们

都注意到，在所有罪犯中年轻人最多，然而法国为了他们，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制度。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正确引导的教育会造成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没有谁否认过这种主张。即使它不会使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也会使人的某项专业技能水平得到提高。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坚持了错误的教育原则，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一塌糊涂，尽管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杰出人士为此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但他们仍然固执己见。我本人在曾经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因为糟糕的教育制度，法国将多数受教育者推向了社会的反面，为社会主义阵营培养了无数的优秀成员。

这种制度也许非常适合拉丁民族的性格，其主要危险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一种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一心学好教科书便能够提高智力水平。由于坚持了这种错误的主张，统治者便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教科书的内容。这种强化贯穿于从小学到大学的始终，除了死背书本，年轻人的判断力和个体主动性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背书和服从成了他们受教育的主要手段和目的。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努力学好课堂知识，死记硬背某种修辞或文章的要点，然后像复读机一样，出色地完成效仿、重复的过程——还有哪种方式比这一方式更让人忍俊不禁的吗？这里面的每一个步骤都充斥着信仰的意味，

即从不质疑老师的正确性。由此带来的恶果是，完全低估自己的潜力，并使自己的能力永远停留在婴儿的水平。”

倘若这种教育只是毫无用处，我们尚且可以对孩子们报以同情之心，尽管他们没有在小学里进行一些必要的学习，但毕竟学到了一些关于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1]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的危险程度远不止于此，它使受教者对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感到强烈不满，急切地想要逃离出去。工人不想从事工业生产，农民不再将农业丰收当一回事儿，而大多数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让他们的子女捧住国家职员这个铁饭碗外，别无他求。法国的学校根本不对学生将来的生活做考虑，而是一心要将学生培养成政府职员，并且教育学生在这个行业里取得成就。因此根本不需要自我的定向，哪怕一点点的个人的自主性都被视为异端。这种制度使大量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组成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支大军总在为自己的悲惨命运鸣不平，并想通过暴动来发泄对这种不公的挑战。而在社会的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是不折不扣的小人，他们对国家抱以迷信的态度，将其视为天道，同时又将国家视为敌人，总是推卸责任，并试图将这种责任推诿给政府。倘若掌权者对他们置之不理，他们便会毫

[1] 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是中世纪墨洛温王朝时代（6—8世纪）由法国人建立的两个王国。

无成就，成为废人。

政府通过教科书式的教育，培养了许多有学历的人，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得到使用，从而大部分的人只能处于失业状态，整天无所事事。因此，部分捷足先登的人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岗位，而那些没有获得工作的人便沦落到社会底层，逐渐走向了与国家对立的一面。从金字塔的最顶端到最低层，从教授学者和各级长官到卑微的小秘书，大量的获得了文凭的人涌向各种政府部门，谋求着最平凡的官差，整天碌碌无为，而资本家想要觅得一个为他打理生意的优秀管理者却难于上青天。在塞纳一地，有两千名男女教师处于失业的悲惨状态，然而他们均瞧不起农田或工厂，只想从政府那里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职位是有限的，于是那些未被选中的人便心怀怨恨，成为了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随时会成为暴动的一分子。他们全然不管这场革命的目的和领头者是谁，他们只为发泄心中的怨恨。因此，**学而无用与学而不用是爆发动乱的最直接的原因。**

很明显，现在想要改正过错，已经来不及了。失败这位成功的母亲，会严厉地指出我们的过错的。它已经得到证明，那些令人厌恶的书本和愚蠢的考试已经到了非废除不可的地步，必须通过勤劳的教育来取代现有的教育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极力想要逃避的殖民地事业当中去。

今天，我们祖辈们所理解的教育便是人们所需要的所谓专业教育。在今天凭借个人思想、创新水平和建功立业的能力而引领国际的诸多民族中，这种可悲的教育制度仍然大行其道。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在很多著名篇章中清楚地指出，今天美国和英国的教育制度与我们以前的教育制度相差不大。他通过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比较，明确说明了这两种方式所产生的后果。

可能人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形之下会觉得，继续接受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虽然它只能培养出一些不能学以致用而满怀怨恨的人，但是将很多粗鄙的知识教给学生，使他们能将教科书倒背如流，也许会提高他们的智力。但它真的能提高智力水平吗？真是天方夜谭！只有判断力、经验、开拓精神和个性才是取得成功的条件，而这些东西是书本所不能给予的。教科书和字典只能作为参考工具而存在，长时间地把它们储存在脑子里，就如同将一堆垃圾放在仓库中一样，毫无用处。

那么，怎样才能让专业教育起到提高智力水平的作用，使它所起到的作用立于古典教育的水平之上呢？泰纳先生有过精彩的说明，他说：

一种思想一定形成于天然的规律。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青少年只有经常投入到生产车间、工地、各种法律场合、图书馆

和医院当中，体验并得到直接的资料，才能有利于他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他必须亲自接触所有的器具、物质和实施过程；他一定要经常和消费者、工人和农民打交道，而不必去考虑他们的业绩和效果的好坏，也不必去考虑他们是否盈利。只有通过这种方法，通过耳眼手口去感受世界的各个细小的方面，才能得到一些很小的看法和见解。青年人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了这些知识，并通过自己仔细地琢磨，早晚会在心中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并激发他们学以致用欲望。然而法国人却在这种最好的七八年的美好时光中，因为被禁锢在学堂，缺少与社会的联系，而被迫丧失了这些难能可贵的亲身经历的机会，丢失了学习的必要条件。从而对于人情世故，对于怎样去协调人事，不会有恰到好处的完美的方法。十之八九的人将自己年轻时的具有决定性的生命时光浪费在了学校。这十之八九的人中又有一半以上的人整天围着考试转悠，最后又被抛弃，而另一半的所谓成功者，殚精竭虑、夙兴夜寐，眼里却只有那一张张花花绿绿的证书。那些兢兢业业者在预定的一百二十分钟的时间内，怀着对智者，对活着的百科全书的无限膜拜，规规矩矩地坐在一群精英人士的面前，暗想：一定不能出差错——他们总是这样苛刻地要求自己。在那个预定的时间里，他们可能对答辩团专家们的提问对答如流，堪称完美。然而不需要太长时间，他们全都会抛置于脑后。他们的考核永远都会不过关，因为那些像杂物一样杂乱地堆积在他们脑子里的东西会一天

天地消失，而且他们似乎也不再想学习新的知识。在人们眼中，他们也许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此时，他们已经身心俱疲，那种年轻人的精气神没有了，更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按着俗世的规矩组建家庭，谋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本分地干着工作，整天围着生活打转，将自己的视野、见识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他们的前程也就这样到头了。于是就这样过着平凡的生活，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却收获甚微。然而就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我们与英美一样，实行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也得到了这样的结果，甚至人们的生活比现在还要好。

在之后，很多有建树的心理学家又从我们的制度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制度中找到了差异。后者的学校要比我们少得多，他们的教育是以专业课程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死记硬背的课本上。例如，他们的工程师是在车间里通过实践训练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几门考试培养出来的。这种方式表明，每个人都能够将他所能达到的智力水平挖掘出来。如果他的能力不够，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发展，那么他可以从事工人或领班的工作，倘若有天赋异禀，他便会成为工程师或者获得更高的能力。相比于将个人前程全取决于青年时的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这种办法似乎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对社会也更加有利。

在医院、矿山、工厂、田野，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非常年轻就开始了学习的学生们，有规律地过着他们作为学习者的时期，这种经历与律师秘书或艺术家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正式开始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容器，以便很好地容纳他们快速学到的知识，而且还能将自己业余学到的技能利用起来，由此与他们所获得的日常经验逐步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际的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并且与学生的才能、发展方向以及他们未来的工作和任务的要求相符合。因此在英美国家，年轻人很快便能找到发挥自己才干的工作。如果各种外在条件都很充足，在二十五岁之前，他就能成了一个合格的工作者，甚至还具备了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而且还会是个发动机。而在制度与英美相反的法国，人们愈来愈向中国靠齐——由此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关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越来越与实践生活相脱离，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这三个教育阶段，人们为了准备各种考试、取得学历、拿到证书和获得文凭，而将在学校里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设置得过长，而且负担太重。哪怕只从这个角度考虑，所采用的办法即是极其荒谬，这是一种与自然

规律不相适应，与社会对立的制度。设置了很长的在校学习时间，生活学习一体的学习模式，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培训和灌输式教学，课业繁重，从不考虑将来，不为成年人的工作和年龄做打算，不为学生们即将要为之贡献力量的现实生活打算，不为学生们在其中施展拳脚、需要适应并为之预作准备的社会做出合理的考虑，不为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必须要面对各种挑战考虑，不为人类为了保住自己生存的地盘而需要未雨绸缪，并磨炼出钢铁的意志而考虑。总之，不可或缺的武器、意义重大的训练、贯古通今的学识和坚强的意念等一切东西，法国的学校都没能教给年轻的学生们。学校非但没有让学生们培养起能够很好地生活的能力，反而使他们的这种素质被侵蚀磨灭。因此，当学生们走出校门，涉足他们将要大展拳脚的地域时，一定会有诸多非常棘手的矛盾始终伴随他们，而他们除了抓耳挠腮之外毫无办法，甚至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持久的难以治愈的创伤，有时还会让其生活的本能受到严重打击。这种难度大，安全性系数又非常低的教育实验非常不利于人们内心想法和社会公理的协调并存，甚至会造成不能复原的后果。对美好生活的幻想会由于不良教育制度的冲击而很快破灭。这种被骗和失望的打击让人难以接受，从而引发其他一些不可预测的行为来。

上面的论述是否离群体心理学的主要思想有十万八千里远？显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要掌握正在群众中谋划、不久的将来便会浮出水面的各种思想的话，就必须要知道为其提

供养分和平台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教育能够使年轻人了解这个国家将来会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当前这一代人所受到的学校教育，却让人徒增遗憾。不管是使人们的头脑更加聪明还是愚蠢，教育都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作用力。因此必须做出明确的解释，即当前的教育制度是什么样将人们的脑袋变成这个样子的？人们本来应该安静地生活，是什么让他们组成了一支戾气冲天的大军，这支大军时刻准备接受社会主义者和巧言令色者的呼唤，并甘心为其所用？如今，凡是有学校的地方，就会有社会主义者，学校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可谓是披荆斩棘。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提要：1.物象、词语和套话。辞藻和套话的神奇力量/被辞藻唤起的形象与辞藻本身的力量有很大的关系，但与它的真正含义是各自独立的/时期和民族的不同，形象也会各不相同/常用的辞藻，其意义也经常发生变化/改变同一事物名字在政治上产生的效果/词语的含义因种族不同而发生改变/欧洲和美国对“民主”有不同的理解。2.幻想。它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幻想存在于所有文明的起源中/群体不喜欢真理，而更加沉醉于幻想。3.经验。能让必不可少的真理扎根群众脑子里的只能是经验/经验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产生效果/告诉群体未获得经验需要的付出。4.理性。群体不相信理性/他们完全受感性因素影响/逻辑思维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是什么导致了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

我们刚才研究了使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得以发展的非直接的前提条件。现在我们还需要研究一下对意见和信念的发展发挥作用的直接性因素。在下述内容中，我们将讨论怎样掌控、驾驭这些直接的因素，才能使之充分发挥作用。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对群体的感性、思想和行为方式进行了深入讨论，根据这些知识，便可以从对群体的思维产生干扰的方式内，整理出很多普遍性的依据。我们已经知道哪些事情会对群体的幻想力产生刺激推动的作用，也知道了暗示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形象产生的暗示力量及其传播的过程。然而，正如暗示的来源可以来自多方面一样，也会有不同的因素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因此必须分别给予研究才能很好地得出结论，这样的研究才是正确有益的。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1]一样，我们必须找出群体的心理学问题的答案，否则我们将会毁于群体之手。

一、物象、词语和套话

在研究群体的幻想力时我们就清楚地知道，它非常容易被形象产生的印记诱惑。这些形象虽然不一定会随时出现，但可以巧妙地运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将其激活。一旦经过升华，它们将会拥有令人惊奇的力量，能够在群体心中掀起滔天巨浪。当然，使怒吼的海面平静下来也是它们所具备的能力。直接或间接因为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去了天堂的人的数目相当惊人，如果将他们的尸骨堆积起来，其高度就算是古老的齐奥普斯^[2]金字塔也要为之汗颜。

词语的力量与它们所激发的形象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

[1] 古埃及和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怪兽。

[2] 齐奥普斯，公元前3—4世纪的埃及法老。

又是与它们真正的意义相独立的。某些诱发了重要事件的词语往往含义不确定。比如民主、自由等含义极为模糊的词语，即使搬出一车的专著也弄不清楚它们指的是什么。但就是这区区几个意思模糊的词语却有着非常神奇的力量，它们就像包治百病的灵药一般，似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各种差异极大的藏匿于内心深处的欲望及其实现的希望，全集中于它们身上。

打倒词语和套话的永远不会是讲道理和逻辑推演，因为它们永远是和群体捆绑在一起招摇过市的。它们所到之处，每个人都会将它们奉若神明，顶礼膜拜。它们常常被人们看作是来自神明的力量，甚至是超乎神明之上的力量。它们能唤起人们心中宏伟壮丽的幻象。当然，正是它们含糊不清，才使它们的力量显得更加神秘。它们就像是坐在圣坛上的神灵一般，信众只能怀着虔诚之心，诚惶诚恐地走到它们面前。

词语所幻化的物象往往与它们的含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形象因为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化。但是套话是不会改变的，部分暂时的幻觉是必须与套话相联系的，词语就像闹钟一样，被用来提醒熟睡的人们。

但是，有些词语和套话是不具有激发物象的能力的，有些词语可能在某段时期具有这种力量，却在一段时间后它的这种力量又慢慢消失了，对人们的头脑失去了指示作用。此时它们便成了没有用处的空话，使用者也就不再苦思冥想了。当我们将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知识用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时，我们就能很好地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就不会因缺少处理事情的经验而苦恼了。

当我们对某种特定的语言进行研究后，发现它们的变化脚步要明显慢于时代的变迁，然而它们所激发的物象，或人们对它们的意义的理解，却经常发生变化，未曾停滞过。因此我们要非常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是那些离现在很久远的已经死亡的语言，是绝无可能的。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某些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想要读懂几百年前的法语著作时，我们是在干什么呢？我们除了用现在的意义和观念来揣摩个人的意思外，别的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只以古人的信念和形象为底本，这些人的境况与我们有天壤之别。大革命时的人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但他们除了把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含义强加在古代的词语上之外，还做了一些什么呢？什么也没做！

希腊人的制度和如今用同样的词语制定的制度有哪些相似之处？在那时，少数传统的贵族控制国家是共和国制度的本质，那种制度是由一小部分沆瀣一气的残暴的统治者掌管着一群百依百顺的奴隶构成的。这些贵族集体统治不能脱离奴隶制而存在，倘若没有了奴隶制，它们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只能走向灭亡。

“自由”这个词同样是这样。在一个人们从未奢求思想自由，在一个人们不敢讨论城邦的诸神、法令典章和传统信仰，

否则将会被加上不可赦免的罪名的地方，“自由”的要义与如今所蕴含的要义之间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比如“祖国”一词，在雅典人或斯巴达人的意识里，是单指雅典或斯巴达的城邦崇拜，还是具有别的含义？但肯定不会指由彼此敌对甚至常年相互征伐的城邦所组成的全希腊。那么，“祖国”这个词对于古代高卢人来说，又有什么含义呢？它的各部落和不同种族相互敌视，它们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故此，恺撒能够很轻松地就将它们征服，就是因为这种状况给它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提供了可能性和方便。罗马人之所以能够缔造一个由高卢人组成的国家，是因为他们统一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不用说太远，将时间前推二百年，今天，“祖国”一词对于法国人来说，与那个伟大的联合外国人来推翻自己的统治者的孔代的理解有相似之处吗？过去，法国那些流亡在外的保守派，认为自己推翻已经变质的法国是在坚持民族本性。因为封建制度下制定的法律，是将诸侯与主子联系在一起的，而非土地、君主在，祖国在；君主亡，祖国亡。由此可见，他们所理解的“祖国”的意义，与现代人脑子里的“祖国”是有很大不同的。

词语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是经过漫长的努力而达到的。有人曾精辟地说，要想正确地知道封建社会与统治者相关的称呼对于我们祖先的意义，大量细致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相比之下，在对那些更加复杂的概念做出研究时，付出的努力与艰辛的程度会要严重得多。

由此可见，词语的含义只是暂时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所赋予它的含义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若想将它们作为干扰群体的一种手段，那么弄清楚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族群中所具有的意义是首要的任务，这不是去了解它们在过去某一时刻具有的含义，更不是某个特殊的个人所给它下的定义。

因此，当政治动荡或群体的信仰发生变化，使群体对某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感到不满和讨厌，而事物又与传统组织联系密切又无法改变时，那么一个聪明领导人的正确做法便是在尽可能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变换对某些词语的定义。托克维尔曾经就说过：“国家和掌权者的作用就是用新瓶装旧酒，用新名词替代旧制度旧名称，防范人们对旧制度产生联想。”“地租”、“盐赋”、“摇役”、商号和行会的税款等，摇身一变，成了“土地税”、“盐税”、“间接摊派”、“执照费”等。

可见，对当下风行的用语，或者在民众中已经失去了市场，或者某些民众已经嗤之以鼻的名称之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是政治家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名称所发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如果处置得当，一定能使最恶心的东西耳目一新，从而被民众接纳。泰纳正确地指出，正是合理地使用了“自由”和

“博爱”这种利于民众所接受的说法，雅各宾人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相提并论的暴政，建立起类似于宗教性质的审判的场所，干出比古墨西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反人类罪恶。统治者的统治是一门高深的艺术，他首先应该懂得如何正确、巧妙地使用语言。在相同的社会环境里，不同的社会成员对同一个词的理解有时候会相差甚远，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有可能像孙悟空的筋斗，一去十万八千里。这也是要掌握语言这门艺术的难处之一。

从以上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促使词语的意义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的首要因素是时间。如果再对种族因素加以考量，同一个词语在同一个时期，素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对其意思的理解也会千差万别。若非见多识广，是很难理解这种情况的。我只想表明一个观点，那就是群众使用最多的那些词，往往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意义。比如“民主”和“社会主义”等流行的词语，便属于这种情况。

其实，“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是非常对立的思想的代表。拉丁民族认为：民主主要是指个人权利的使用要依附在国家所代表的权力下而存在，简而言之，个人意志服从国家。国家是这个社会的主宰，掌握一切、生产一切、垄断一切。无论是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一切党派一概依附于国家才能生存。但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地区，“民主”一词

是以个人意志为最高意志的，国家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服从并保证这一意志得到充分的超常发展，除了制定政策、指挥军队和管理外交关系外，国家没有支配其他任何事情的权力，连公共教育都不能染指。由此可见，同一个词，一个民族将其定义为个人意志服从国家意志，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个人意志的无限放大并得到保障，国家要服从个人的意志。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观念。

二、幻想

文明出现后，群体就处在幻想的影响之下，或者说生活在幻想之中。群体对幻想制造人顶礼膜拜，为他们树碑立传，建庙立坛，赋予他们的荣耀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人。无论是关于宗教的幻想还是关于哲学的幻想和关于现实世界的幻想，这些坚不可摧、高高在上的力量，存在于任何一个不断发展的文明的灵魂中。因为它们，古巴比伦和埃及建立了宏伟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因为它们，一个世纪以前，发生了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大动荡。可以说，我们所有的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都被它们牢牢掌控，无时无刻不是活在它们的强大影响之下。有时，人类为了消灭这些幻想，不惜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然而它们似乎注定还会起死回生。倘若没有它们，群体似乎没有办法走出自己原始的非文明状态；倘若没有它们，群体似乎就会很快回到这种非文明的状态。丝毫不用怀疑，它们只不过是些毫无用处的幻想出来的形象而已。但又不

得不承认，各民族创造出的辉煌的艺术或伟大文明，又都因为这些存在于我们梦想中的产物而产生。

倘若将那些博物馆和图书馆毁掉，倘若将那些与宗教有关的一切作品和艺术纪念物全都毁掉，人类伟大的梦想后面恐怕什么也留不下。让人们尽情地拥抱那些希冀和空想吧，不然他们该怎样活下去呢？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神明、英雄和诗人存在的原因。科学全面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已有约五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对理想有着热切渴望的人们的心里，它是不完美的，因为它不敢说大话，因为它必须说真话，人们在它那儿得不到大的承诺。

19世纪研究哲学的家伙们致力于破坏宗教信仰、政治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幻想，然而这些幻想又是我们的祖辈们在许多世纪内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幻想被破坏、消灭，生存的希冀和原动力也就随之灰飞烟灭。此后，人们站在没有方向，没有声息的自然的力量面前，对弱势和充满爱心的东西毫不动心。我们的哲学也许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它一直都没有提出一种梦想——一种能够使群体为之疯狂的梦想。但在社会上生活着的广大群众却必须要有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幻想，为此他们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他们便像饥饿的鱼群一样，游向那些给他们提供食物的投机分子面前。促进民族进化的主要原因，

永远是荒谬，而绝不会是天道真理。如今，共产主义之所以会这样地不可一世，原因就在于它迎合了群体的需求。尽管有科学证据表明了它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依然阔步向前。它的主要力量来源于什么，即那些吹嘘者常常罔顾事实，不合实际地向群体吹嘘着“天堂”的美好，这是何等的具有诱惑性啊！如今，这种社会主义的空想在曾经的废墟之上作威作福，并将此作为它们将来的活动阵地。群众的本性决定着他们不需要真理，面对哲学家们提出的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一定会扬长而去，只要是对他们有诱惑的东西他们都崇拜，即使那些东西是谬论；凡是能向他们提供梦幻、承诺幸福的人，他们会自觉地成为其奴隶。谁想要在他们通向仙界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它。

三、经验

唯一能够使真理在群体心中占据一席之地，使群体避免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的较为有效的手段是经验。但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经验发生在一个足够广大的时间范围内，并且能够再现于人们的生活中。通常情况下，父辈的经验对子辈所产生的用处是少得可怜的。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真实的历史事件被当作证据引用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的原因。它们仅仅证明了，一种有效的经验哪怕只想微微地触动一下那些深深钻进群体头脑中的谬论，也需要循环式的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才能实现，更遑论消灭这些谬论。

不用多想，史学家们一定会把19世纪以及之前的一些的年代看做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它们的经验之丰富是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

在诸多经验当中，法国大革命是最宏大的试验之一。找到一个社会应该在理性的指导下，从头到脚清洗一遍，并使之脱胎换骨，这一定会使数百万群众陷入惨遭罹难的境地，使欧洲这片大地至少二十年里深陷泥潭，不能自拔。为了用经验向世界表明，服从于独裁者的民族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要在五十年之内进行两次毁灭性的动荡。诚然，动荡产生的后果是明确的，也许令人信服的程度不是那么高。第一次动荡带来的是三百万人死于非命和一次外部势力的侵入，第二次动荡是法国部分领土被迫割让出去，并在动荡之后，向人们证明了设立常备军的重要性。此后也许还要爆发第三场动乱，也许就在某一天突然降临到人们的头上。要向整个国家证明，德国军队并不是多少年前人们所认识的那样，它仅仅是一支没有害处的保卫国家的卫队而已，就一定要再爆发一次使我们陷入万劫不复的战争。最少要二十年的毁灭性的试验，才能让一个民族认识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是自取灭亡。这样的案例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四、理性

若非为了证明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否则在能对群众的内心世界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一般不必将理性包括在内。

诸多的事例证明，群体是非理性的，对推理置若罔闻，他们只对那些从七零八碎的观念中凑起来的观念感兴趣。所以，那些精明的吹嘘者们，总是会处心积虑地利用群体的感性对群体进行诱惑。缜密的数学逻辑定律根本不能对群体造成任何的影响。如果你想要说服群体，第一步就是要弄清楚他们的兴趣兴奋点，并且表明自己也有同样的感情，然后只要以一些低劣的方式，用一些在社会上有广泛基础的暗示性观点去影响群体服从自己的观点，倘若有必要的话——再返回到当初的观点，慢慢地了解引起某些舆论的情感缘由。一切有效的演讲都要根据现场的效果不断地随机应变，这样的演讲是不可能在事先进行精心准备的，他需要演讲者具有良好的素质和过硬的应变能力。一场事先准备好的演讲，演讲者遵循的是事先设计好的思路，一旦群体脱离了这种思路，演讲将会陷入尴尬的地步，这样的演讲是失败的，它不可能使群体认同并服从自己的观点。

拘泥于逻辑关系的人，总是习惯性地借助于严密的逻辑论证方式，所以在演讲时，便会如同老师教学生一样，有意或无意当中借助于灌输式的说服方式，一旦群体对他们的论证不感兴趣时，就会陷入沮丧当中。曾经有位专注于逻辑研究的学者写道：“通常情况下，基于三段论，即通过一组公式得出的数学上的结论是唯一的……因为这种唯一性，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它能够很好地推演这一组公式，我们都会承认它的推演结果。”站在逻辑学的角度，这种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但是群体

是不会遵守这种组合的，况且它能不能理解这种组合还是个未知数。就好比我们用理性的思维去与蒙昧无知的原始部落或者婴儿对话，从这样的事例中我们便可知道这种论说方式在蒙昧无知面前会显得多么地苍白无力。

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用理性去对抗群体的感情会是多么可笑和不值钱，都不用将群体降低到原始的无知状态，我们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比如就在几百年前，那些与最简单的逻辑都相违背的宗教迷信思想是那样顽固地根植于群体的脑袋中！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里，就连最聪明的天才也不能突破它们的桎梏，最后拜倒在它们面前。一直到现代，它们的那些可怕的规矩才稍微有些被动摇。在很多伟大的时代，都曾出现过很多开明的绅士，但遗憾的是没有人将理性纳入到自己的思考当中，既没有清楚地了解到自己迷信中的那些非常天真、粗俗的观念，也没有怀疑过恶魔和巫师的滔天罪行。

我们不必贸然地对群体从来不相信理性的行为表示遗憾。不容置疑的是，在激励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幻想功劳不小，是它带领着人类爆发激情、走向愚昧；相反，理性却没能发挥丁点儿的作用。作为控制着人类无法察觉的力量

的产物，这些幻想是一定要有的。每个种族的命运定律都隐藏于它的精神成分中，并且由于它有一种不能控制的冲动，故而只能被这些定律控制，哪怕这种冲动看起来是不能想象的。有时，各民族似乎被一股冥冥之中的神力控制，它们与使行星在

自己轨道上准确无误地运行的力量相似。

如果我们想认识这些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就应该对一个民族的一以贯之的进化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但是，如果只是对这一进化过程中的某些单一的个例进行研究，无疑是不会得到结果的。因为历史绝不是由一些荒诞的偶然性的孤立事件所造成的。一个平平常常的泥瓦匠不可能变成一个持续几千年的上帝，使人类最重要的文明在他的基础上产生；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要想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土地，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以期望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那只是白日做梦，一个笑话而已；在普遍实行于欧洲，且各地政权等级森严的时代，小小的一个炮兵中尉这样的低级军官要想征服众多民族及其国王，那是一件多么异想天开、痴人说梦的事情啊。

所以，理性是只属于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它不适用于对人的统治，这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必强求。理性并不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或者说，即使存在理性，文明的发展依然依赖于群体的各种感情——例如个人或国家的尊严、牺牲精神、信仰、对自己国家的爱护以及对荣誉的崇拜等。

第三章

群体领头人及其说服手法

提要：1.群体的领头人。任何群体动物都需要有领头人/群体领头人的内心世界/是他们把群众集合起来，并让群众具备必要的共同信仰/领头人的独裁/领头人的类别/意志的用处。2.领头人的说服方式：决言、反复强调和感染等方式的不同用处/互相感染的过程是由下而上的/群体的意愿在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广泛存在。3.声望。声望的含义和类别/声望的传承和自己声望的建立/实现方式各有不同/什么方式能够动摇声望？

我们已经知道了群体精神世界的构成情况，也知道了哪些力量可以对群体的头脑产生作用。但是，这些力量是通过什么方式而起作用？使它转变成现实力量的实施主体又是谁？这两个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一、群体的领头人

任何生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或者植物，一旦发生聚集，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具有等级的群体，必须要有一个领头人来管理这个群体。

从人类这个群体来分析，能成为领头人的，一般都不是什

么大人物，只要能够煽动群众便有机会成为主角，当然，他的作用并不会因为他的地位太低而有所减弱。他的意见对群体意见的形成与统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是不同类型的人团结起来的首要条件，他为群体组织的形成消灭了障碍。群体就像一列火车，缺少了车头，便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前进。

所有的领头人在刚开始时也是群体中的一只小羊羔。他本人经常处在迷惑之中，随后就成了领头人的心腹。他是那样心无旁骛地痴迷于某些信念和思想，以至于那些与之相悖的信念都被他嗤为异类而不能容忍。比如罗伯斯庇尔，他发疯似的痴迷于卢梭的哲学，为了传播它，竟然不惜动用起宗教裁判所来。

领头人，天生就是个实实在在做事情的人，而不是整天窥天洞地的哲学家。他们不会有洞察天地的天资异禀，更何况现实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思想家往往缺少决断的能力。在成为领头人之前，他们往往都看起来神经错乱，整天跟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不已，疯疯癫癫。不必去理会他们所死守的东西是怎样地不合实际，甚至是荒谬的，但他们的内心始终如一，且这种精神是任何道理都摧毁不了的。他们全然不顾外界的指责和漠视，有时这种外界的干扰反而会使其更加奋进。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没有个人的趋利性，舍弃了自己和家庭的所有好处，就像将军战死沙场一样，他们除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之外，别无他

求，以至于他们的话语是那样地富有震慑力和感染力。人们都是愿意服从那些内心强大的人的，当然，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对怎样使人们服从于自己的意见的方法熟稔于胸。集合在一起的人们不再有属于自己的思想，他们都会很自然地完全信赖一个高他们一等的具有强大力量的人。

各民族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领头人。但是，不是所有领头人都会运用自身强大的品质来产生激励。这些领头人常常使用花言巧语，对群众诱之以私利，利用人们某些下流的本性来胁迫群体。他们借此虚张声势，但是这种方式只能产生暂时的效果，并不能长久维持。坚持于某种主义的狂热分子，能够触及人性深处的人，比如隐士彼得、路德、萨伏那罗拉这些人，也包括引领法兰西大革命的人物，他们都是自己先痴迷于某种信念后，才使群体中的人也痴迷于这种信念的。只有这样形成起来的信仰，才能成为群体灵魂中坚固的长城，才能让群体为他们所用，成为领头人理想的忠实执行者。

完全不必去理会信仰是属于宗教、政治或社会的哪一种类型，也不必在意信仰的标志物是一本书、一个人还是其他，群体中强大的领头人在信仰的形成中永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领头人的威力是无法估量的。信仰的威力是人类所能掌控的所有威力中最为突出的，它的力量足以排山倒海。信仰能使一个无赖瞬间变成能量强大的有用之人。历史上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大事件几乎都是由那些无名之辈发动的，除了自己

坚守的信仰，他们一无所知。宗教的广泛传播，帝国的无限扩张，等等，这些依靠做学问和研究哲学的人是不可能的，依靠那些对一切事物持怀疑态度的人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然而，对于上述事件，我们的关注点只在那些伟大的领头人物的身上。伟大人物通常比较少，我们很容易就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处在金字塔的中间，顶端是些不可一世的老板，基层则是卖命干活的人，在充斥着烟味的小饭店内，他们不知疲倦地将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其同伙们，并让同伙们倾倒在自己的观点之下。至于那些言语的真正意思，他们未必懂得，但是他们依然坚信，只要按照这些话去做，所有的理想和希冀都会成为现实。

在任何一个社会，从高贵的君主到卑微的贫民，人一旦融入群体当中，思想便会马上被这个群体的领头人所干扰。很多人，尤其是处在群体中的一些人，除非是自己的专业，否则，对任何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而此时，领头人便成为他们的指路明灯。当然，某些媒体也能够替代他们，即便效果要大打折扣，但这些媒体却为领头人物赢得了舆论的支持，给他们准备好了一套完美的说辞，使领头人无须在言辞上徒增烦恼。

群体的领头人具有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威信，这种绝对权威是掌控群体的先决条件。人们一定能看到，他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做权威的靠山，就能让那些最激进的工厂的工人完全服

从自己的指挥。他们制定工作制度、确定薪资水平，他们令工人工作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全部来自他们的指令。

目前，由于政府的无能以及不作为，使其越来越处于软弱位置，从而给这些领头人和煽动者窥视政府机关的职位提供了机会。这些国家的新的掌权者的施政结果是，群体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指挥，而不能像对待政府那样暴力。倘若遇到了某个难以预测的缘由，领头人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群众便会因为有了领头羊而四处乱窜。在一次巴黎马车从业人员的罢工中，最终因为领头人被抓，罢工宣布结束。使自己的灵魂处在群体之中，并非是为了实现群体的自由，而是满足一下自己变成奴才的目的。他们的骨头天生就是那样软弱，所以谁想要成为他们的主人，他们都会虔诚地接受。

可以将这些巧言令色的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指那些精力旺盛，但做事且三分钟热情的人。与之相比，另一类人则是持之以恒的。前一种是一些草莽之徒，在突发事件中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能够带领群体中的人前赴后继，能让刚入伍的战士很快成长为战斗英雄。以前的内伊和缀拉和现在的加里波第便是这样一类人。像加里波第这种人，虽然一无是处，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不惧危险的人，他曾指挥很少的人战胜了由一支良好的军队保卫的那不勒斯王国。

虽然这样的领头人的力量也应该包括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但它只是昙花一现，很难长久地发挥作用。当他们重新回到社

会生活中后，他们性格中为人所不齿的那一面便会暴露无遗。毫无疑问，在复杂的环境中他们是个好的领导人，但在生活中，他们却是个无知的弱者。在某些条件下，他们也服从于更高级别的领头人，并常常受到来自上层的激励。他们一定要受到某个人或信仰的指挥，一定要给他们制作出完美的地图，他们才能按图索骥，否则就要迷失方向。而另一种类型的领头人，他们能够持之以恒地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哪怕只是在幕后指挥，但是发挥出的作用却是巨大的。比如圣保罗、哥伦布和德·雷赛布等宗教和宏图大业的开创者都属于这一类型。他们大多智商很高，且睚眦必报，但这无关大局——因为他们掌握着这个世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持之以恒的精神，有了这种因素何愁不能控制一切？我们很难经常给这种精神做出精确的评判。谁也不要企图战胜这种精神，即便是天地山川又或者是天神也不能。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造成什么结果，德·雷赛布举出了一个事例，说明了持之以恒的毅力所产生的强大作用。他企图把世界划分为东西两半。这种事情在过去三千年的时间里有些强大的国王也做过，只是都未能获得成功，徒增遗憾。后来他在一件与之相类似的事业上失败了，可能是源于他那衰老的身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战胜年龄，哪怕强大的意志力也只能在它面前服软。

如果想找出凭借意志力就能完成一项事业的例证，查一下

苏伊士运河开凿时相关的历史记录便可一目了然。该项工程的决策者向一个参与者讲述了整个工程的相关故事：

一天又一天，循环往复，无论风雨，他都在述说着与运河相关的令人惊奇的往事。他讲述他所征服的所有事情，讲述他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他挡回去了所有的抵制意见、说服了所有反对他的联合组织，经历了所有不如意、不顺利和不成功，他依然信心百倍，毫不退缩。他常常遭到英国的阻挠，法国和埃及对这项工程总是犹豫不决，开工之初法国的领事机构又公开叫嚣，有人想通过断绝他们的饮水，逼走工人们。他还讲述了海军官员和工程的设计、施工人员，所有经验丰富又训练有素的人，都站出来反对他，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们都以科学为依据，准确地预测到了灾难正向人们靠近，连时间和地点都计算出来了。

与这些强大的领头人的生平有关的书，大多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却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伟大事件息息相关，不能分割。

二、领头人的动员方法：决言、重复和感染

倘若想要迅速调动起群体的积极性，并让他们积极参加任何的行动，比如占领王宫、坚守要地等，就一定要求群体以最快的速度响应领头人的指令，其中模范所产生的作用是最明显的。只是要想成为模范，应该提前为群体做一些准备，尤其是领头人应该具备某些人格魅力，我们将这种魅力称之为声望，

这是我们将做进一步细致讨论的内容之一。

但是，当领头人计划用各种不同的社会学学说来干扰群体的思想时，所运用的方式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其中有决言法、重复法和感染法三种比较常用且简单明了的方法。这些方法有的属于慢性药引子，开始时可能反应比较迟钝，一旦起作用便能产生持久的作用力。

宣布果断有力的决言，是让领头人的信仰占领群体的头脑的最好方法，不需去理会任何理性的说辞。一个决言越是果断有力，所有的理性看上去就越乏力，决言就越有力量。任何时代关于宗教和法律典章的书总是用果断有力的决言写成的。那些动员群体为某项政治利益去做斗争的政客们，那些通过媒体去宣传销售商品的资本家们都深谙此道。

但是，如果只有一成不变的说辞，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反复宣传，决言不会真正起到作用。拿破仑曾说过，重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修辞。只有通过连续的重复，才能让决言根植于群体的头脑当中，并最终以真理的形象被群体接受。

就连那些最聪明的头脑都会被连续不断的决言所征服，重复的力量可见一斑。这种强大的力量是这样产生的：当一个决言不断地在我们耳边刺激着我们的耳膜时，它已经悄悄地深入我们的脑海了，我们也许不会发现此时我们的行动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它控制。一段时间后，我们甚至会忘了当初对我们施以决言的那个主体，但会对这个主张如痴如醉。这也是商家们

之所以如此看重广告的效应的根源。倘若你不断地接受这样一个信息：某某巧克力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便会以为其他人都这么认为，最终把它当成事实。倘若有人经常在你耳边说：某某药对治疗疑难杂症有着良好的效果，一旦我们或者身边的人不幸患了此类病痛，它便会赫然出现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假如我们常常阅读的一张报纸总是在赞扬一个人而贬低另外一个人，那么最终我们就真的会接受这张报纸的观点，除非有另外一张报纸将这种观点颠倒过来。决言及其重复性都具有强大的力量，倘若它们在战场相见，厮杀必定分外激烈、难分高下。

假如将重复决言这件事情运作得相当完美，且在这个过程中其他观点都被同化或者踢出局的话，就像那些富豪可以控制其他的金融项目竞标者一样，此时，决言就会成为主流意见，由此产生强大的感染力。思维、情感、心境和信仰就像病毒一样，感染性非常强大。这种现象十分常见，在所有聚集在一起的动物中，都有这种现象。马厩里如果有一匹马做了伤害工人的动作，另外的马也会对工人做出同样的动作；羊群中如果有部分羊受到惊吓，整个羊群都会躁动起来。在群体中间，情绪的感染会更加迅速，由此可见恐慌的发生都比较快速。头脑风暴就和发疯一样，非常容易被感染。有一件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很多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医生最后自己也变成了疯子。其实不仅仅是人，动物的某些不安定情绪可能是人类感染给它们

的，比如紧张、害怕等症状。

感染群体的必要条件，并不是一定要这个人处于静止的状态。某些事件能让群体的意识都倒向他这一边，并形成这一群体的独特秉性，这种事件能让远在天边的人也能受到这种力量的感染。尤其是在群体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再通过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加以干扰后，更是如此。比如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爆发后，它由巴黎迅速影响了欧洲的大半部分，狠狠地动摇了一些封建专制统治。

在众多的事件里面，效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归根结底要归功于感染的作用。这个观点已在我的另一本书中有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此处只插一句我十五年前的一个观点。这些观点也被一些作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效仿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天性。因为效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故此，效仿也就具有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流行才会变得如此有威力。面对意见、思想、文艺乃至衣服，没有几个人敢与之唱反调，模范而非理性地永远掌控着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任何时代都有几个特立独行的人，并成为个别愚昧群体效仿的对象，但是这些特立独行的人想要公然地与主流观念对抗的话，将会使被效仿变得异常艰难，更不必说产生影响了。正因为如此，过分超前的人是不会对这个时代有任何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之间是有一条底线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欧洲人有先进的文化，但它们却不能深刻地作用于东方世界，

因为东西方还隔着很长的一段路。

从更长的时间来看，时间和效仿会使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域内的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相像，即使是那些超然世外的人也不例外，比如思想家、学者和搞文学创作的人，他们从头到脚无时不展现出同样的魅力，从而一看到他们便能知道他们所属的时代。其实，要想知道一个人的读书习惯、兴趣爱好，根本无须经过长时间的交流，只需了解其生存环境即可。感染具有强大的力量，人们不得不慑于其威力而接受一些观点和情感方式。某些著作在某个时期不被群体所接受，主要原因便是感染在作祟——那本开始时被人唾骂，几年后人们又对它大加褒扬的著作——《唐豪塞》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群体的信仰只会通过感染，而绝不会通过逻辑推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如今在无产阶级中风行的观点，大都学自于广场，这全是决言、重复和感染的功劳。建立群众信仰的方法在每个时期都是大同小异的。勒南曾经说过：“创立基督教的人只是一个将信仰从一个广场搬运到另一个广场的搬运工而已。”伏尔泰说，在谈到基督教时他也注意到，“一个多世纪以来，基督教所接纳的信徒都是一些社会上的卑劣的流氓”。

应当说明，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一样，感染将广大的群体征服后，便会向上流社会渗透。今天的社会主义信仰不就表现出了这种渗透性吗，它已经被那些信奉者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感染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经过它的干扰，人们甚至愿意将自

己的一切个人利益抛弃。

由此可以解释：被群体广泛认同并接受的一种观点，最后都会势如破竹般地进驻金字塔的顶层，无论这种取得胜利的意見是多么可笑和荒诞不经。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体的观念或多或少是由更加深层次的观点衍生而来的，因此它在群体自己的领域内往往不会再起到很大的作用。领头人和那些煽动者接受了某种高深的思想后，对它进行改编，然后窃为己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被污染了的组织，然后在群体中攻城略地，而那些被征服的群体又会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观点一旦得到广大群体的广泛认同后，它就会很快地调整自己，然后对着精英阶层开炮。放眼历史的长河，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是人类发挥聪明才智的结果，然而这只是一种非常间接的影响。经过我的这一分析，哲学家的思想似乎获得了空前的胜利，然而当初的哲人们早已随风消逝，化为白骨了。

三、声望

信仰在运用断言、不断重复和感染的方法为群体广泛认同后，在客观世界中获得了巨大的能量，此后，它们又会获得一招独门绝技，这招绝技叫声望。

世界上无论哪一种掌控的力量，不管是信仰还是人抑或是动物，都会利用强大的声望之手来增强其掌控力。对声望这个词是很难下定义的，虽然这个词妇孺皆知，但不同的人的使用

方法千差万别。基于声望，人们可能是投以赞扬、羡慕的眼神，也可能心生畏惧。有时，声望以感情为基础，但也并非离开它便不能存在。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佛祖等已经去世的人是最大声望的获得者，因为除了赞扬，我们不会对他们产生畏惧。此外，还有一些具有声望的存在，也会让我们心存畏惧之心，虽然它们只是虚幻世界的东西，比如那些供奉在印度神庙中的神明。

在生活中，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人，一本指引我们前进的著作，或者某种具有诱惑性的信仰都能支配人们的头脑，这种控制人们头脑的力量就是声望。它会迷惑我们的心智，使我们对它满怀惊羡和膜拜，使我们失去原有的判断力。与人们对模范人物所产生的幻想一样，我们同样很难准确地理解声望这种东西。声望是获得一切控制力的主要条件。任何人，如果缺少了它，权力的获得只能是梦幻泡影。

声望有很多种，总的来说可分为先天声望和个人声望两大类。先天声望主要从名号、富有和荣誉中获得，它与个人声望是相独立的。而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声望为一人享有，它虽然可以与先天声望共存，并因此而更加巩固，但没有先天声望它照样能很好地存在。

人们经常能感受到来自于先天的声望。处于某种地位、享有金钱、被赐予了一种封号等等，都是一个人获得声望的重量级的条件，有了这些条件，人们大多会忽视其本人的作用，哪

怕他是个白痴。人们见到手握钢枪的国家卫士，手拿法典的审判长的时候，景仰之情油然而生。帕斯卡尔说得好：法袍和假卷发是一个法官必须要常常准备的东西。没有这两样，他们的威信便会大打折扣。即便是目空一切的社会主义者，在王侯将相面前也不敢太放肆。获得这些称号的人，要想夺取商人的利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上述的两种声望，它的实现主体是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在各类观点、文艺作品等事物中得以体现的。这类声望是从经年累月的积累中得来的，比如那些连续复述某些思想观念的文艺历史。没有人会对这些思想加以证明，每个人都将它们当作真理传承下去，直到最后人人对它加以肯定。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认真研读《荷马史诗》是一件极度无聊的事情，但是没人会将这种厌恶表达出来。现在看来，巴台农神庙只是一堆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断壁残垣而已，但是，因为它的声望，使之看起来并非只是废墟，而是承载着人们的所有历史影像。由于声望的干扰，使我们很难透过事物的表面来洞察其本质，从而使我们的思维变得迟钝。群体与个人一样，常常希望对所有事情不用思考便能获得现成的答案，至于这些被广泛认同的答案是否正确，他们全然不在乎，他们只对声望保持绝对的服从。

下面我们对个人声望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是一种性质与先天声望全然不同的声望。这种声望不依附于任何封号和权力，

与它们毫无关系，且只为少数人所有，这些人能对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一种神秘的影响力，不管周围的人是否与他平起平坐，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特权。但是，周围的人信服他们的信仰，认同他们的感情，服从他们的指令，就像凶猛的狮子对驯兽师绝对服从一样。

那些不朽的群众头领，如佛祖、耶稣、拿破仑等，都具有这种崇高的声望，而且他们之所以取得了崇高的地位，与这种声望是密不可分的。各洞仙人、大侠壮士和各种宗教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存在，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影响群体心理的神秘魔法。当然，他（它）们是经不起推敲和讨论的，稍一推敲，他（它）们便会灰飞烟灭。

前面所讲到的一些人，早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一种神秘的魔法，若非这种魔法，他们的成功就如同马尾提豆腐——不可能。比如，处在荣誉金字塔顶端的拿破仑，仅权力这一点，他就获得了常人所不能比的声望。然而在他尚未获得权力，仍然名不见经传之时，他也有了小小的个人声望。在他还是个不被人看重的将军时，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让他去指挥意大利军队。他突然发现，他的同事们是一群不老实的、决意要给他难堪的将军。见面会时，拿破仑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也没有拿出某种姿态，更没有威胁这些将军。当他站在这些将军面前的一刹那，那些人便彻底地服从于他了。泰纳根据当时的回忆文章，对那个神奇的时刻做了精彩

描述：

包括奥热罗在内的那些师部的将军们，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武夫形象，他们一直因为自己孔武有力的形象而趾高气扬。听到上面派遣拿破仑来指挥他们的消息后，奥热罗怒气冲冲地来到营地。听到别人介绍拿破仑有多么厉害时，他总是报之以轻蔑的态度：他只不过是巴拉斯的一个丑陋的小人，一个因为旺达事件而侥幸晋升为将军的投机者，一个在学校里靠打架斗殴取得学历的混混，一个幻想成为数学家和空想家的怂人。见面时，波拿巴让那些将军们先在外面等着，当他们看到这个佩着剑、威武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他环顾了一下，然后庄重地戴上军帽，掷地有声地向将军们传达了将要采取的作战部署，下完命令后，就让将军们撤出了军营，不多说一句话。在这期间，奥热罗跟个哑巴似的。等到撤出到帐外后，他才像平常那样口无遮拦地说起话来，以此来找回刚才丢失的自信。他不得不承认马塞纳的看法，因为他已经被这位身材矮小的神秘将军给镇住了，他都不清楚被一股怎样的神秘气场给压得快要窒息了。

成为重要人物后，拿破仑的声望与荣誉与日俱增，在那些拥护者的心中，他已经如同天神一般。那个经历了大革命、野蛮程度比奥热罗更甚的旺达姆将军，在1815年与阿纳诺元帅一

起进入杜伊勒利官时，曾这样描述拿破仑：“那个魔鬼一样的拿破仑一定学会了某种幻术，不知道为什么，我与他见面时，就像一个小孩子见到了严厉的老师一样，战战兢兢，双腿忍不住发抖，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禁不住打战。看见他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所有见过拿破仑的人几乎都有过同样神奇的感觉。达武在谈及他和马雷对国家的忠诚时说：“如果国王做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后命令我们，‘让巴黎城内的所有一切都消失吧’，我想马雷肯定会死守国王的秘密决策，但他一定会事先让自己的家人逃到别的国家或者地方去，而我却不会那样做，因为我担心我的真实情感会被别人知道。”

必须让这种令人神经亢奋的力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才能对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到法国这一行为有所明白——只有他一个人，却以惊人的速度占领了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的伟大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只需要他对那些立下军令状，企图打败他的那些将士们递一个眼神，那些将士们便乖乖地臣服于他了。

英国的吴士礼将军说：“拿破仑，只不过是一个从厄尔巴岛逃出来的犯人，却在形单影只的情况下，回到了法国大陆，而且在数周之间就使法国国王的权力王国土崩瓦解。没有别的方式能比这个方式更能显示一个人的威势有多大。在这一场终结之战的自始至终，他在他的盟国面前从不示弱，

使得盟国只能跟着他的思想转，以他的意志为意志，他几乎使他们臣服！”

拿破仑的声望显然比他的寿命要长寿得多，并一直在提高，以至于他从一个无名之辈一跃成为掌管一个国家的国王。他的很多事情一直到今天都妇孺皆知，可见，他的声望使多少人对他产生崇敬之情。只要有高不可及的声望，只要你是将声望施之于人的聪明人，你就可以随便杀人，就可以无休止地征战，以至于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惨遭杀害而不被谴责。

是的，以上都是些独特的个例。然而为了使那些著名的宗教、著名的学术和强大的国家的源头更加清晰，拿来说一说也是大有用处的。这些事情最终能够成功，声望是先决条件，它功不可没。

当然，声望的基础不仅仅是以他自己的权力、武力或信仰为基本条件的。它的来源也许来自一些平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是不容小视的。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事件来说明。比如那些将陆地分成两半，使地球上的状况和国家间的商贸往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著名事件。哥伦布之所以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靠的是他非同常人的意志力，也靠的是他让群体为之倾倒的魅力。为了顶住别人施给他的压力，他从不多说，而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一切。因为具有强大的魅力，他三言两语就可使敌人成为朋友。起初，英国人的抵制之声最强，然而当他的双脚踏上英国的土地时，人们都倒向了他这一边，纷纷支持他；当他老年

的时候经过南安普顿时，教堂里的钟声为他而鸣响不停；而现在，在英国又出现了这样一些声音和活动，以呼唤人们用他的形象制作雕像，供人瞻仰。

战胜了所有应该战胜的，包括敌人、事业、天地、山川等等，然后，他坚信自己无所不能，自信心极度膨胀，接着，他甚至幻想在巴拿马附近也挖一条水上通道。他照着之前的经验来干这件事情，然而，他已经老了。虽然他有着挟泰山以超北海的豪迈，然而信念再强大也大不过那一座座大山，信念是没办法移动的。后来，因为他的盲动，灾难降临了，灾难使他曾经荣耀的光环变得黯淡失色。他的一生是声望形成与消失的一生，有过极高的辉煌，也输得一败涂地。在取得了历史上无人能及的丰功伟绩后，却在自己的家乡沦为阶下之囚。没有人去在意他的生死，当他的棺材从街道经过，除了一些外国政府礼节性地对他表达了尊敬和怀念外，所有人都未曾表示过一丝的怜惜。

上面所讲的这些例子依然很极端。然而，列举一些极端的事例对详细地研究声望的心理学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一系列的事例中，一头是享有极高声望的人，一头是喜欢攀比炫耀的小老百姓。

在连接事物两极的中间地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所产生的所有不同的声望都在此地带占有一定的位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使群众信服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便是声望。

当人们纷纷指控：“在费迪南·德·雷赛布后，人们便失去了对哥伦布表示哀悼的资格。假若雷赛布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那么所有的空想者都成了他的帮凶，成了罪犯。因为他使地球发生了变化，使世界万物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古人总会赋予他很多的荣誉，赐予他代表着奥林匹克精神的圣水。每一个民族都会出现这样的人，比如因为指控费迪南·德·雷赛布而名垂千古的首席法官，他们不会因为一个老者成为他们的信徒而心生恐惧，更何况这位老者常常诋毁自己曾经所处的时代，并竭力为当代社会做贡献。

“在没有创新和开拓性的举动的地方，哪有什么正义的未来可谈！每一个民族都需要那些充满自信、克服困难、铲平阻碍的勇敢的人，这些人不会将自己的生死看得非常重。那些天才都是具有大胆创新精神的，胆小怕事是永远不可能将人类的生活空间无限放大的。

“……费迪南·德·雷赛布在苏伊士和巴拿马这两件事情上深深地体会到了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从这一点来看，他颠覆了人们普遍认同的成功学伦理。当他成功地将两个海洋连通起来时，国王和所有的民众都给了他无上的光荣；然而，当他站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为自己悔恨时，他只是个没有一点儿修养的到处行骗的人而已。……从这种事情的最终结果来看，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充满着不和平的因素，那些资本家和商人对工人阶级不满意，最后，他们制定法律，用来打击

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在那些心存高远理想的精英面前，制定法律的人总是处在窘迫和尴尬当中，至于群体就更加不理解这些理想了。斯坦利（比利时著名探险家）是个精神病，费迪南·德·雷赛布是个招摇撞骗的败类，这是一个大律师早就向我们证明了的。”

因为受到传染的作用，群体会在无意当中效仿那些享有声望的人、信仰或其他事物，从而使整代人都形成了相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往深一步讲，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效仿过程，正是这种效仿性，揭示了它的完全性。现代的一些画家们极力想要去重现原始社会的一些色彩和单调的动作，然而效仿出来的东西的生命都要比想象出来的东西的生命力要弱很多。面对他们的真心，我们觉得是值得信任的，然而在没有任何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将这种艺术完全重现的情况下，那些画家们所学到的只是一些最低级的东西。很多杰出的画家，通过他们的画笔在画纸上绘满了紫罗兰，然而他们现在要想像五十年前那样，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紫罗兰是相当困难的。他们并未见到真正的紫罗兰，而是受到了某位具有影响力的画家的自主性和其他印象，以及另一位画家的个性和特殊印象的影响的支配，也就是说得到了他们的提示，而这位奇怪的画家却从中享有的声望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事例在所有与文明有关的条件中，不胜枚举。

由此可以知道，声望的获得，有很多因素对它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成功这一要素，它是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某个

取得了成功的人，某种被别人所认可的观点，在获得成功后，人们便再也不会质疑它。成功是建立声望这座大厦的基石，一旦这一基石被挖走，整座声望的大厦将会如摧枯拉朽般倒塌。英雄们一旦失败，昨日的鲜花和掌声便不再属于他，迎接他的只能是沉重的羞辱和白眼。曾经所获得的声望的高低与受到羞辱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在通常的情形之下，这种如今与群体成为一样的人的末路英雄的日子是相当难受的，因为群体要为自己曾经的卑躬屈膝报仇，他们一定会对失败的英雄进行报复。曾经的罗伯斯庇尔在他砍了同谋和敌人的脑袋后，获得了非常大的声望。当他失去了权力之后，声望便立刻消失了，群体就像他曾经那样，也将他的脑袋砍去。一旦曾经奉若神明的人失势，群体就会凶狠地将他的一切统统打倒，甚至付之一炬。

倘若有一种声望没有成功作为坚定基石，这种声望不会长久保持下去。当然它也会在不断的质疑声中受到损害，只是时间要稍长一些而已。但不管怎样，质疑也是非常可怕的。有问题的声望便不能称之为声望。那些长久地享有声望的人，是绝不会容忍质疑的存在的。要想使群体对声望享有者保持绝对的信仰，就必须让质疑消失。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提要：1.坚固的信仰。广泛被人们接受的信仰很难改变 / 它们是主流社会的主要内容 / 要想铲除它们，难度很大 / 从哲学上讲，信仰虽然是荒谬的，但这并不会对它的传染产生不利因素。2.群体的想法具有易变性。除了主流外，所有的意见都非常容易改变 / 近一个世纪以来思想和信仰具有多样性 / 怎样区别这些多样性 / 哪些事物容易受到多样性影响 / 媒体的混乱促使观念和思想发生变化。

一、坚固的信仰

——所有生物的生理特点和它的心理特点是极为相似的。我们能在所有的生理上的特点中发现一些很难轻易发生的变化，或者变化很小的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原因，这些改变要以很长的时间单位来表示。在这些稳定性极强、很难轻易毁掉的特点之外，也会发现一些很容易就发生改变的特点，如某些通过养殖、种植的技术就能轻易使之发生改变的特点，以至于有时人们都会认为它没有了这些特点。

在心理的特点上，这样的现象也一样会发生。除了坚不可

摧的民族秉性之外，民族的一些因素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在探讨一个民族的观念和思想的时候，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上的某些观念就像沙丘上的沙尘一样变化不定。

群体的信仰和思想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首先我们有些信仰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须长久坚持的，这种长久的坚持能够持续数百年的时间，是整个文明不能缺少的基石。比如封建思想、儒家思想、各民族所信奉的教义，以及现在所流行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与民主。另外，有些思想和观念是非常容易改变的，它们往往是由各个时期内不断被更新替代的一些大众观点所产生。比如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等一些对文艺产生了影响的观点和论著，这类观点往往都是表象上的，并不能触及本质，它们的变化就像潮流的变化那样，非常快速，又像池塘水面上时而泛起时而平静的小波浪。

那种非常强大的被群体所广泛认同的信仰是非常少的。这种信仰的兴起和衰败都会在每一个种族的文明史上掀起巨大的波澜。这种信仰是一座文明大厦的真正的基石。

让一种思想短暂地感染群体是很容易的，然而要想让这种思想深植于群体的头脑之中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如果这种信仰已经得到认同，要想使之从头脑中消逝也是非常有难度的，除非进行暴力革新——即便是这种信仰早就不能对群体的头脑产生支配和作用力也必须进行革命才能祛除。这时的革

命，就像清理工一样，只是在对道路的垃圾进行打扫，虽然无关紧要，但这些信仰对人们接受新东西还是有一定的阻力的。对这种信仰来说，革命的开始，便是它们生命的终结。

当群体开始对一种信仰的意义产生怀疑的时候，便是这种信仰开始衰败的时候。所有的信仰都是以一种虚无的形式而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条件是被群体认可而不是质疑。

当然，一种信仰的消逝过程也不是顷刻之间能完成的，即便是已经处在消逝的危险境地，因为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一定会竭力使之维持下去，从而减慢了这种信仰消逝的速度。只有当这种信仰病入膏肓，回天无力时，以之为基础建立的一切才会以极快的速度走向灭亡。有史以来，还没见到过哪一个民族在其原有的全部文明条件没有被彻底破坏时，能够使群体完全地接受新的信仰。这个民族在完全接受一种新的信仰之前，其转变的脚步是不会停留不前的。因而，在信仰完全确立之前，它会长久地形成一种无组织的散乱状态。一种被群体广泛认同的思想是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且不能缺少的中流砥柱，它是每一种思想发展方向的主导者和决定者。只有这种思想才能促进信仰的形成，并培养群体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

每一个民族对获得广泛认同的思想所能得到的好处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会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广泛认同的思想消亡，他们便会随之衰落甚至灭亡。罗马人疯狂地崇拜罗马，是他们战胜世界其他民族的信条；当这种信条灭亡的时候，罗马也就走

向了自己的坟墓。当然，在那些践踏了罗马民族的原始人也获得了一种被普遍认同的观念后，形成了一个整体，并结束了那种没有组织的局面时，他们也能和当初的罗马人一样。

每一个民族在保护本民族的信念不被侵犯时，难免会表现出其狭隘的一面，这是情有可原、无可厚非的。这种针对哲学上的质疑而表达的不能容忍性是一个民族延续的非常重要的秉性。正因为如此，中世纪才有那么多的突破陈规、努力创新的人被那些信仰的保守者送上了断头台，即便是侥幸免于一死，也终究因为看不到希望郁郁而终。正因为一个民族在保护原有信仰中所表现出的狭隘性，这个世界上的悲剧才会不断地上演，才会不断有年轻的士兵已经或者将要命丧战场。

一种为群体广泛认同的信仰的建立过程是一个披荆斩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的过程，然而，当这种信仰建立起来后，无论它在哲学上是怎样荒诞，怎样幼稚，它都会很快占据人们的大脑，坚定而不可摧毁。在一千五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所有的欧洲民族不是一直都在死死地、不容争议地捍卫着那些如莫洛克神^[1]一样无知的神话吗？上帝自己捏出来的动物不听指令，便要自我摧残，让所有的残忍的刑罚都加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笑话啊，然而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没有谁质疑过它的合理性。即便是如伽利略、牛顿、

[1] 莫洛克神（Moloch），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崇拜的神灵。

莱布尼茨那些天资聪颖，有着过人天赋的科学家、专家们也没有对这种幼稚的神话提出过丝毫的质疑。为群体所广泛认同的信仰就像一个催眠师一样，可以迷惑群体。我们头脑的认知能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也没有必要去试图找出一些证据来加以证明。

一种新的具有迷惑性的思想一旦占据了人们的头脑，群体便会为之疯狂，所有的社会制度、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及艺术的表达都由此而得到发展。处在这种境地之中，人们时时都被它所掌控。实干家们极力想要让这种信仰付诸实践，法律制定者费尽心思要将这种信仰蕴含在所有的法律条文之中，搞哲学的、搞艺术的全都倾心于通过各种手法来颂扬这种信仰，别无他求。

有些暂时被人们所认同的思想观念都是从最普遍的信念中衍生出来的，从它们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最普遍信念的身影，比如古埃及文明、欧洲中世纪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宗教信仰产物，从这些文明的很多细小的事情中，我们都能很轻易地看出它们的烙印。

所以，因为有这么普遍的信念，各个时代的人们总能在一个大体相似的思想、传统习惯的环境中汲取成长的养分，并受这些信念控制。人们的行为方式受制于信念，同样受制于由该信念所产生的传统。我们的生活中所有细微的行为都受着普遍信念的支配，即便是独辟天地的精神世界也毫不例外。那些

悄无声息地控制着人们脑袋的信念才是真正的恶政，因为它控制你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不用质疑，如提比略^[1]、成吉思汗、拿破仑等确实是典型的残暴的统治者，然而，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等宗教领袖们，却一如既往地对人类实行着另一种方式的统治。要想打倒一个现实意义的统治者，有时一个阴谋就可以了，然而要摧毁一个固执的信念，却毫无办法。在致力于摧毁罗马天主教的革命中，法国大革命是以那样狼狈的失败方式收场，即使法国大革命收获了所有群体的同情，即使它使用了强大的破坏方式。那长久地被人们所悼念的一堆堆白骨，那些他们自编自导的虚幻世界，才是对人类实行残暴统治的真正的幕后黑手。

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普遍的信念从来都是荒诞无知的，但这一直以来都没能阻挡它走向胜利的舞台。不过，倘若它们失去了为它们的荒诞无知提供条件的神秘力量，它们也只能是一败涂地。所以，虽然如今的社会主义信念破绽百出，但依然被广大的群众所信任。相比较于那些宗教上的信仰，它是烂得不能再烂的信仰，因为宗教的信仰所宣扬的幻想都只能在来世获得，从而失去了驳斥的基础，而社会主义所宣扬的幸福却要实现于现世。倘若真的有人为着这份信仰而努力的话，这种许诺马上就要获得自己给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

[1] 提比略（Tiberius，公元前42—公元37），古罗马帝国第二代皇帝。

境地。所以，这种信仰本身的力量在它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便不再增加。正因为如此，这种新的信仰虽然也和其他信仰一样，也以破坏为起点，然而破坏之后，它并不能产生任何的创造性。

三、群体意见的多变

以上所述的是信念力量的顽固性，然而在这个基础上，还会不断地衍生出一些肤浅的意见和思想。它们出现的时间都比较短，有的也许只出现在短暂的瞬间，个别重要的也会短于个人的存世时间。它们的出现只是表象而已，它们受制于某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比如法国的政治制度，虽然如左派、霸权派、保守派等党派从表面上看各有各的施政纲领和宗旨，但是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不是由各政党所决定的，而是来自于法国的民族精神，而且不同的民族在同一名称下会产生一切不同甚至相悖的目的来。然而，不管那些思想的名称是什么，也不管它用什么方式去欺瞒群体，其本质的东西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热衷于拉丁文学，眼里只有罗马共和国，将它的法律典章搬过来使用，然而他们始终还是法国人，因为罗马被一个异常强大的帝国所控制。研究哲学的学者们的责任是找到远古时代的一些思想观念里支持其表象发生改变的东西是什么，从而得知在常常变化不定的思想观念中哪些东西受到普遍的信念和民族秉性的控制和干扰。

倘若不对这种经常性的变化加以哲学验证，人们会陷入一种对政治和宗教信仰的改变的随意性幻觉之中。这一事实已经在如政治、宗教、文学、艺术等中得到了证明。例如，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法国在1790年到1820年这短短三十年的时间，这三十年恰好经历了一代人。在这一段时间内，最终的君主制的拥趸者当中大多数人在最初却是极端的保皇派，而后又积极地捧着帝国主义的臭脚。在宗教上，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经历了背弃天主教投向无神论的怀抱，然后又向自然神论卑躬屈膝，最后又无耻地跑回到了天主教堂。发生这些变化的，除了群众之外，还有那些极具煽动性的领袖人物。而一些国民公会中的重要人物会令你大跌眼镜，这些人原本极力反对国王，对上帝和主人一概不相信，最后竟然恭敬地匍匐在拿破仑脚下，而在路易十八掌管国家的时候，他们又谦卑地在神明的面前唱起了颂歌。

从那之后的七十年的时间里，群众的思想观念又经历了很多次的转变。19世纪初，在拿破仑的继任者掌管国家的时候，曾经违背信义的英国人又一度成为法兰西的朋友。而曾经被法国人侵略了两次俄国，在法国处在倒退落后的境地的时候，幸灾乐祸地以强者的姿态与法国联盟。

意见发生变化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且变化的速度更快。所谓的浪漫情怀、自然精神和神秘主义等，相

继进入历史的舞台，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感。那些在昨天还被人们举得高高的艺术家和作家们，眨眼的工夫就被重重地摔在地上，鲜血横流。

然而，在我们对所有的这些表象的变化进行细致的研究时，我们就会知道：那些与民族广泛认同的信念和秉性背道而驰的东西，都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即便有一段时间内逆风而上，但不久便要顺风而行。那些跟民族的普遍的信念以及感情没有丝毫联系，从而变化非常快的思想观念，只能随风摇摆，与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这种随意变化的信念唯一值得赞扬的地方便是，它会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依托暗示和传染而形成一种短暂的表象。它们如鲜花一样，开也匆匆，谢也匆匆，又像沙滩上的沙画，涨潮时分便消失在潮水之下。

就现在来看，人们意见变化的数量相较于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曾经的信仰的威慑力正一天天地变弱，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再也没有能力去促使一些暂时性的意见的形成。曾经广泛性的信仰正在消耗往日强大的力量场，这给那些凭空而起的一些突发性的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群体自身的力量在逐渐变得强大起来，且越来越难以控制。从而那些非常容易发生变化的群体的观点便在这个时

候肆无忌惮地得以表达。

再次，因为报业等媒体的快速发展，它们将那些与普遍流行的主张几乎完全相悖的观念传递给了民众。每一种单独的观念所起到的影响会被其他意见以最快的速度摧毁，从而使所有的观念都得不到普遍的认同，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如今，当一种观念还没来得及受到更多的人的膜拜时，就已经夭亡了。

正因为这种种的原因，世界正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姿态面向世人，这是这个时期典型性和标志性的特征。而这些原因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政府在掌握舆论的方向上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正确的方法。

就在以前很短的时间内，只需要通过国家管理者制定的措施、几位有名望的作家以及少数几家报纸，便能切实地将群体的舆论表达出来。而现在，文艺工作者已毫无影响力可言，报纸媒体则像一辆运输垃圾的汽车一样，只负责传递这些观点。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僚们就更不必提了，他们除了盲目地追寻各种观念外，哪里还有引导舆论的能力？正因为他们这种害怕甚至惊慌的心理，以至于他们制定的政策方针常常是朝令夕改，难以得到切实的执行。

到最后，群体的观点竟然逐渐演变成国家开展内政外交的最高指示，已经到了可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结成友好的联盟关系的地步。比如就在刚刚不久前形成的法国与俄国的联盟，便是群体观念产生出来的结果。如今出现了一种不正常

的现象，教皇和那些皇帝们愿意向媒体谈论自己的观点，好像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需要通过群体的讨论后才能加以实施一样。在过去，人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处理政务应该更多的基于理性去考虑问题。然而，当群体的非理性思维挟制了政治，处理政治上的事情还能受到理性思维的影响吗？显然不能！

如今，那些曾经对群体意见起到主导作用的报业传媒也受到了政府的影响，臣服在强大的群体观念的力量面前，变得卑躬屈膝了。不过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只是这种影响不再是引导群体的观念走向，而是成了群体观念不断发生变化的传递者。报业部门只负责为人们提供信息，而将引导群体观念变化的责任抛之脑后了。因为竞争的缘故，它只能随着群体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而对自己的责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对于报业部门来说，没有读者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以前那些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等强而有力的被人们当作精神导向的报纸如今已面目全非了，它们或者已经破产消失或者变质成为了各类具有现代气息的报纸，那些重要的信息总是被那些娱乐、绯闻和金融欺骗等信息所淹没。如今，某些作者想要将带有自己观点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对于现在的多数读者来说，他们只关注信息，而对那些具有价值取向的观点丝毫没有兴趣，这种意见对他们来说也是毫无价值的。那些评论家们再也不敢对一部著作或者一台戏剧的成

功与否做出评鉴。他们可以骂人甚至人身攻击，但绝对不能提供意见。报业部门非常了解，任何意见都是毫无用处的，它们只能对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进行封锁，在评论时最多写上书名，然后说上两三句无关痛痒的话。在将来的二十年，戏剧评论也可能要遭遇同样的境况。

如今，报纸等媒体部门和国家机关的首要任务是时刻关注各种各样的群体意见。它们要在任何人之前对某件事、某条法律、某一次演说所产生的影响做全面细致的了解。这可是一项相当有难度的任务，因为你根本就不能掌控群体想法的变化速度，他们也许今天还在大肆地宣扬某件事情，到了明天便会会对这件事情嗤之以鼻，甚至诉诸武力。

因为引导群体意见的力量消失了，群体所广泛认同的信仰又已经被摧毁，所以对社会上的任何一种事件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信念，而且群众对那些与他们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事情丝毫不会放在心上，总以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冷眼旁观。社会主义信仰的信徒们大多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文化层次非常低的贫苦群众，如矿工和工人。至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或者收入不高的中产阶级，要么成了最积极的反对者，要么就是信念不坚定，左摇右摆。

在过去二十五年内，群体意见变化与分歧的速度非常快。而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二十五年前，群体的意见还没有形成过大的分歧，群体大都保持着同样的基本信仰。人们有着稳定的

历史观点和科学观点，他们明确地拥护或反对君主制或者民主共和。拥护君主制的人坚信“猴子”是不能变化成人的，而坚持共和的人则视“猴子”为人类的祖先；君主制拥护者向着国王说话，向往共和的人则以大革命的崇高之名发表演说。我们在谈到一些名人时，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言辞间应该饱含着宗教般的虔诚之心，而谈到另一些人如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时，斥责是必不可少的。在法兰西的索邦^[1]，这种对历史的简单的理解方式是广泛存在的。

而今，由于意见快速变化的缘由，所有的观念都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现在所有的意见所具有的特点都会快速消失，这种暂时的特征要想激发人们的热情是有相当难度的。所以，现代的人们已经没有了信仰，变得如行尸走肉一般。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忧伤于信仰的缺失。毫无疑问，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缺了席，那么它的生命也即将终结。不用怀疑，那些伟人、眼光独特的人以及群体的领头人，总之，是那些怀着真诚之心，且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与那些极尽反对、批判之能事或者碌碌无为之人相比较，发挥的作用肯定要大。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当前群体势力庞大的现状。所以，倘若某种意见的声望强大到足以使自己为人们广泛认同时，那么它离获得专权的地位就不远了，所有的事物也就完全处于它的掌控之下

[1] 索邦，指巴黎大学。

了，从而这种散乱的、随意变换意见的状况也就会灰飞烟灭。群体有时是个优哉游哉的绅士，如赫利奥加巴勒等人，但有时他们又是暴躁的变化不定的小人。倘若一个文明衰落到屈服于群体时，它也就喘息不了多久了。当然，假定群体的意见总是处在摇摆不定、变化不定的状态时，或者群体已经不再相信曾经被广泛认同的信仰时，这种文明还是可以苟延残喘几日的。

乌合
之众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提要：常见群体的种类。（1）异质性群体。它们有哪些类型 / 种族对群体分类的影响 / 群体精神无法与种族精神相匹敌 / 种族精神和群体精神分别代表文明和野蛮这两种状态。（2）同质性群体。它们的类型有哪些 / 宗教派别、社会团体和不同的阶级。

前面我们已经仔细地分析了群体心理的普遍性特征。需要进一步解析的是，类型不同的集体在受到外界因素的刺激而组成群体时，所具有的特点也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简单地对群体的分类做一个概括。

我们以最简单的人群为分析的起点。当由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形成人群时，这种人群的最初状态便显示在我们的面前。在此种情形之下，唯有领袖的为人们所尊重的力量才能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在很长的时间内，那些常常侵犯罗马的低下的野蛮民族，其组成成分非常繁杂，他们就是这种人群的典型代表。

比由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更高一些级别的，

是那些在共同力量的作用下形成了相同特征，最终成为同一个种族的群体。它们时常以某种种族的特点示人，但它们在某些程度上不是种族因素的对手。

在上述作用力的作用下，这两种人群能够转变成物理的或心理意义上的集体。这些物理的集体主要包括异质性群体和同质性群体两类；异质性群体又包括没有正式称呼的群体（如大街上的群体）以及有正式名称和理念的群体（如陪审团、议会等）。同质性群体主要包括：帮派（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具有特殊身份的团体（军人、僧侣、劳工等）以及社会的不同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

下面我们将对以上这些不同群体的特征做出简单分析。

一、异质性群体

本书前面部分所分析的正是这种群体的特征。它们的成分十分复杂，组成的每一个个体各有特点，职业和智力水平各有不同。

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群体中的个人的心理和他们的集体心理是有着质的差别的，且这种差别已经影响到个人的智商水平。前面已经讲过，个人的智力对集体没有多少影响力，它完全被集体的非理性的心理所掌控。

因为种族的原因，所有不同的异质性的群体特征千差万别。

我们常常认为，种族是决定人们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作用在群体的秉性中也能找到它的踪迹。由巧合地聚在一起

的个人所形成的群体，倘若全是英国人或中国人，与特征不同的同种族的个人，如俄国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所形成的群体，会有天差地别。

当一个群体由不同的种族按照相近的比例组合形成后，尽管这种例子比较少见，他们各自所传承下来的特征会使人的感情和思维方式形成很大的不同状态，且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表现得十分明显，即便他们有着高度一致的利益和目的，但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社会主义者总是在幻想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领袖聚集在一起，却总是因为巨大分歧的产生而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由拉丁民族的人组成的群体，要想将自己的要求变成现实，总是要在国家的帮助下才能实现，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如此。集权的思想已经侵入到他们的脑中，以至于他们对独裁统治没有过多反感。而与之相对的英国人或美国人，他们完全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他们将个人自由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法国的群体以平等为追求，而英国人则认为自由高于一切。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形式会千差万别。

可见，种族的性格在群体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这种力量是决定性的，它掌控着群体的秉性。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强大的种族精神之下，群体的秉性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群体的状态或者掌控群体的威力与原始的蒙昧状态相似，或者说是这种状态的再现。只

有在形成了稳健的群体性格之后，种族才能在更大的空间内脱离那种不能独立思考的集体力量，向着文明的状态出发。抛开种族的影响不说，对异质性群体进行分类的重要方法就是将它归为无名称群体（如广场上的群体）和有名称群体（如那些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团体）。无名称的群体不需要对谁负责，它们普遍缺乏责任意识，而有名称的群体则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因为责任感的不同，造成了它们行动上的巨大不同。

二、同质性群体

同质性群体主要有派别、身份团体、阶层。同质性群体形成的首要步骤是派别。一个派别里的人可以是在教育、职业和社会阶级等方面大相径庭，他们因为相同的信仰而集合在了一起，比如那些宗教和党派。其中最容易形成一个群体的条件就是身份团体。与派别不同，身份团体中的人都来自同一行业，他们有大体相同的修养和大致平等的社会地位，比如军人和僧人。阶级的组成人员来源复杂，和派别以及身份团体都有所不同，阶级中的人是因为相同的利益、相似的生活习惯以及相近的教育经历而联系在了一起，比如中产阶级和农民。

在这本书中，我们只研究异质性群体，而将同质性群体放在另一本书中讨论，因此在此处就不作赘述了。在对异质性群体的讨论即将结束时，我们还将对犯罪群体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必要的讨论。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提要：犯罪群体 / 群体在触犯法律时，在心理上也许不能将其归为犯罪/群体行为完全不受理智的控制/“九月惨案”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他们按照什么逻辑行事、为何这样残忍以及它们的道德观念是怎样的？

组成群体后，经过了兴奋期，群体便会自然而然地走进无意识状态。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之下，群体受到各种各样的暗示力量的支配，从而无法将他们归为犯罪群体。最近的一些关于心理的研究，使这个群体卷入到了风口浪尖，故此我将这一个错误的定性保留了下来。毫无疑问，就群体的某些行为来说，单从其行为的本身来说，无疑是犯罪的，但有些情况下，它们这种错误的行为就如同老虎为了消遣而让幼虎咬死猎人然后将幼虎吃掉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在通常情况下，群体犯罪源于受到了强烈的暗示，群体中每一个犯罪行为的参与者在事发之后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坚信自己是在履行一项正义的责任，这是与普通的犯罪行为最大的不同之处。

历史上关于群体犯罪的例证便给出了有力的说明。

我们可以列举巴士底狱监狱长遇害这件事情加以说明。当这座监狱被攻破后，一群失去了理智的人将他死死地围在中间，并施之以拳脚。有人要对他施之以绞刑，有人要残忍地砍下他的脑袋，并拴在马尾巴上示众。在自卫时，监狱长踢了围攻他的某个人一脚，于是便有人提出让那个挨踢者将这位监狱长的喉咙割断，这个建议一经提出，马上博得了众人的掌声。

“这个挨踢的人只是一个刚刚下班的厨师，因为好奇，跟着人群来到了巴士底监狱。他只是跟着来看热闹的。但是群体广泛的意见就是这样有威力，他的理智被这种暗示给挟持了，让他自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甚至幻想着以处决一名恶人来换取一枚军功章。他从别人那里借来了一把钝刀要切开监狱长的脖子，因为武器太不锋利了，没有成功。于是他又用自己经常用来切猪肉的小刀，像杀猪一样熟练地完成了整套动作。”

上述事件的过程，清楚地向我们证明了一个事实——群体中的个人之所以会听从别人疯狂的意见，主要是因为这个意见来自于集体而变得非常强大，杀人者甚至以为自己做了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因为群体中的同胞们给了他强大的鼓励，使他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形象无比高大。这种事是于法不合的，但是在群体的心理上却被认为是一件很正义的事情。

犯罪群体的普遍特点和其他群体的特点相比，并无二异，都表现为：易受鼓动、轻易相信他人、反复易变、随意夸大好

坏、将自己化身为道德的楷模等。

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在那个法国历史最凶残的“九月惨案”的发动者中间，包括了这所有的特征。其实，那个发动了圣巴托罗缪惨案的群体也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特点。对此，泰纳根据当时的文献做出过非常细致认真的研究和论述。

永远没人能准确地说出那个下令屠杀犯人的人是谁。无论是丹东还是谁，都无关紧要。我们只对一件事情有极大的兴趣，那就是屠杀的参与者受到了来自集体的极大的鼓动。

大概有三百人死于这个杀人群体的屠刀之下，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群体是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它的成员除了个别流氓外，其余的都是匠人、理发师、服务员等手工业者和小个体工商业者。这些人根据别人的鼓动，就和前面所讲到的那个厨师一样，将自己扮演成一位爱国者在执行一项伟大的爱国主义任务。他们闯进了监狱的办公室，同时履行审判长和刽子手的职能，他们丝毫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行为有多么无知，多么罪恶。

他们对自己身上的责任深信不疑，且引以为豪，他们着手建立了公审台，并表现出一副大公无私、大义凛然的样子。因为监狱中人数众多，他们最终决定杀掉所有的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服务人员，而根本没有进行审判，也就是说，在那些“爱国”的杀人者眼里，断定这个人是否有罪，只要看他从事的职业就行了。而要断定其他无业人员是否有罪，那就要看其是否听话，是否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名誉。通过这样的方式使群

体无知的正义感得到极大的慰藉。这种被群体合法化的杀人行为使他们内心深处残忍的魔鬼本性得以无限制地发泄出来。这种本能的来源，我们曾经讨论过，群体总是会努力去满足这种本能的。当然，这种魔鬼的本能并不能阻止群体表达善良的情感，他们的爱心和残忍一样强大。

“他们非常同情和理解那些身在巴黎的工人阶级。在阿巴耶，当有人知道囚徒们已经一天没有进水了，愤怒地想要吃了监狱的管教人员，若不是囚犯们极力求情，那些管教一定被他们残忍杀害了。当一名囚犯被他们临时组建的法庭断定没有犯罪后，群体中的所有人都发疯似地狂欢起来。”然后残忍的屠杀就在这种疯狂的欢乐氛围中开始了。屠杀过程中，欢乐贯穿始终。他们毫不顾忌身旁的尸体，尽情地欢歌笑语，他们还特意为女士准备了长凳，让她们观看处死贵族的表演。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多么罪恶，整个过程反而被一种虚幻的正义感所包围。

阿巴耶的一名刽子手还对那个为了让女士们有更深的感受而近距离地靠近行刑地的主意抱怨不已，因为这样就不能让刽子手尽情地痛打贵族。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延长受刑人的痛苦。在福斯监狱，他们将受害人剥得精光，然后残忍地一刀一刀地从受害人身上刮下肉来，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直到人们大饱眼福后再一刀刺向脏腑，结束受害人的生命。

杀人者们也并非毫无道德可言，我们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曾经说过的群体道德观念的影子。那就是他们绝对不私自霸占

受害人的钱财，而是统一存放在审判台上。

透过他们的行事方法，群体所特有的无知可笑的逻辑方法一览无遗。在一千二百名到一千五百名囚犯被残忍杀害后，竟然有人鼓动说那些关在监狱中的老人、乞丐、流浪者都是一些毫无用处、混吃等死的人，应该将他们也一起杀掉。很快，这名鼓动者的建议就被执行了。当然，被执行者之中不可否认有该死的罪犯，比如那位叫德拉卢的寡妇，是个投毒者。鼓动者说：“她一定非常不情愿坐牢，一定恨透了监狱，她曾经肯定说过，要是她有能力的話一定会将巴黎毁掉。一定要将她这种危险分子杀死。”这些编造出来的话看起来是多么有理啊，就这样，所有的囚徒均被处以极刑，就连那五十名少年儿童也没有放过，他们被想当然地钉在了人民公敌的耻辱柱上，接受杀人者最严厉的惩罚——被一一处死。

当所有的犯人被处决后，杀人者们也结束了一个礼拜的辛劳，刽子手们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然而他们不能满足于此，他们坚信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功臣，他们来到政府门口，要求国家给予奖赏。那些在这次屠杀中表现非常积极的人，甚至要求政府授予其荣誉勋章。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提要：陪审团有哪些普遍的特点 / 根据以往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它们的判决结果不受它们的人员成分干扰 / 哪些方法对陪审团能造成影响 / 辩护有哪些形式以及它们能起到哪些作用 / 掌握高超的技巧是说服关键人物的关键 / 面对不同的罪行，陪审团会做出迟疑或严厉的不同判决 / 陪审团制度产生的良好效果。

要想在本书中对所有不同类型的陪审团一一做出分析评价是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只能挑选法国刑事法庭陪审团这个具有突出特点、最为典型的陪审团做简单的分析。这些陪审团在所有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中起到了模范作用。当然，既然它也属于异质性群体，它就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暗示的影响，也会表现出非理性的特点，当它被群体的带头人所干扰时，也会处在非理性情绪的控制之下。在对这一群体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件，比如有些人会因为不了解群体心理而在陪审过程中制造一些可笑的麻烦。

第一，群体成员在做判决的时候，与他们的智商水平没有

多大关系，陪审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非常理智的团体，当他们被要求就某个非完全技术性的事情表达看法时，他们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也就是说智力并不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比如，一群由科学家或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与一群工匠或小商贩组成的团体在对一般性的问题表达看法时，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相似的。曾经有一段时期，比如欧洲大革命以前，法国政府曾明确规定：陪审团的组成人员必须要从教授、官员、文人等素质高、有修养的人物中选择。而现在，小商人、小老板或普通工作人员成为陪审团的主要力量。然而令人们大感意外的是，不管陪审团的组成人员是哪些人，他们做出的判决总是惊人地相似。以至于那些对陪审制度颇有微词的地方官僚，也得放下高傲的姿态对陪审团制度取得的成果予以承认。刑事法庭原庭长——贝拉·德·格拉热在他的《回忆录》中发表了如下看法和认识：

如今，陪审员的入选条件完全由市议员掌控。他们往往以自己的政治诉求和选举需要为基准，将那些合适的人列入名单，将其他人从名单中划掉。这些被列入名单的人多为做生意的商人（但并非是商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以及某些政府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在法院开庭后，他们的意见和专长变成了毫无用处的摆设。那些满怀热情的、最为善良的新陪

审员都被置于一个和谐的境况之下。当然，陪审团本来的精神是不会有丝毫的变化的，他们还会和以前一样做出相同的判决。

关于上面这段话，我们只需要记住结论就行了，至于那些苍白无力的分析完全没有必要去在意。也不必诧异这种解释，因为法官和地方官的心理是一样的，他们全然不能理解群体心理，因而他们对陪审团也知之甚少。我还在一个与上文作者有关的事件中，找到了一个证明。最著名的刑事法庭出庭律师之一的拉肖，曾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他出庭的所有案件中，禁止那些智商高的人成为陪审团的成员。然而历史向我们证明，这种做法无疑是愚蠢的，起不到任何作用。在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如今的公诉方和出庭律师，以及那些等待受审的人，都不再利用他们手中的关于陪审员的权力，正如德·格拉热所说的那样，无论何时，陪审团做出的判决都和从前一样，没有优劣之分，好坏都一如从前。

和所有的群体一样，陪审团在做出判决时，情感因素起到了很大的干扰作用，以至于他们无视证据的存在。一位出庭律师曾经说过，“陪审团的成员很容易被弱势群体所感动，比如那些处于哺乳期的妇女或者父母双亡的流浪儿。”德·格拉热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如果一个女性在陪审团面前做出一副可

怜兮兮、无比悲惨的模样，陪审团的成员都会被她感动，从而大发慈悲。”

但是出于自卫的考量，陪审团对那些可能会威胁到自身的罪行是毫不手软的，当然，这样的罪行也是威胁社会的毒瘤。然而陪审团在陪审那些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的违法案件时，会因为感情泛滥而显得难以抉择。比如对未婚妈妈杀死自己婴儿的案件，又或者是女性用泼硫酸的方式来报复勾引或抛弃自己的男人等案件，他们一般都非常的仁慈。因为他们觉得，社会的运转不会因为这样的罪行而受到干扰，这样的行为也不会对社会构成很大的隐患。而且在一个法律不保护弱者的国度，女性为自己而复仇是情有可原，而且是有益的，它能够警示那些后来的轻浮者谨慎行事。

陪审团本身也是个群体，因此会受到名望的强烈影响。德·格拉热非常精确地说过，从陪审团的形成来看似乎是非常民主的，但他们贵族化的好恶却能影响对案件的判断。比如“头衔、出身、富裕程度、声望或一位著名律师的帮助，总之，一切特殊的或者有利于罪犯的东西，都会影响到审判的结果，都会对罪犯获得满意的量刑有好处。”

因此看一位律师是否优秀，主要看他感动陪审团的技巧的高明程度。就像对付所有的群体一样，不需逻辑上的严丝合缝，只要使用非常简单的推理就行。一位曾经在刑庭上非常有名的英国大律师，归纳了这样一些刑庭技巧：“在辩护的

时候要时刻关注陪审团，赢得辩护的机会就藏在陪审团成员的所有动作之间。律师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职业素养，要根据陪审员的每一个表情来揣度自己每句话所起到的作用，然后确定下一步的行动。首先要搞清楚，自己已经将哪些陪审员搞定，这对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来说不是一件难事。然后，再把精力投向那些还未被说服的陪审员身上，努力弄清他们憎恨被告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这是律师工作中非常细微又敏感的事情，除了以正义之名指控犯罪嫌疑人之外，其他的理由还有很多。”这一段话指出了律师辩护的全部技巧。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按照事先准备好而没有临场应变能力的演讲总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

当然，辩护人没有必要去说服每一个陪审团成员，只要搞定那些能够左右判决结果的关键性人物就行了。和所有的群体特征一样，在陪审团里也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通过以往的经验可以得知，一两个有影响力的陪审团成员可以掌控所有的陪审团成员。因此，需要使用一些技巧来说服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人。首先，最为重要的是要讨好那几个关键人物。群体中那个最具有权威的人，应该要第一个搞定，搞定他之后，辩护者提出什么证据，他都有可能承认。下面是一段从有关拉肖的报道中找到的反映上述观点的有趣的事情：

众所周知，拉肖在辩护过程中，他的眼睛一定是在那两三个他认为能掌控陪审团其他成员的人身上来回扫视。通常他都

会将这些固执的陪审员争取过来。然而，在一次辩护中，他用了三四十分钟，用尽各种诡计来试图搞定一个陪审员，此人依然无动于衷，场面紧张且尴尬。这个人坐在第二排的第一个座位上，是第七陪审员。突然，拉肖停了下来，向法官请求道：“法官先生，能否允许我将前面的窗帘拉起来？我想强烈的阳光已经将第七陪审员晒晕了。”然后第七陪审员顿时脸红了，并友好地表达了感谢之意。他就这样被拉肖给征服了。

最近有很多作者包括那些一流的作者，发动了一场强大的反陪审制度的运动。然而，为了应对一个不受约束的团体伤害自己，这项制度是目前唯一的办法。而另外一些作者认为，陪审员应该从受教育者中择优选择，但是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学识的高低、职业的好坏、地位的高低对判决丝毫不产生影响。还有一些作者抓住陪审团的把柄不放，认为用法官取代陪审团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我的天啊，他们怎么会这么天真，这些改革家竟然会如此地想当然，难道他们忘了吗？那些陪审团所造成的不公平，首先应该记到法官的名下。况且，被告走进审判庭的时候，就被那些官员等掌权者以先入为主的念头定罪了。所以，倘若取消了陪审制度，那些真正的蒙冤者岂不是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因此，若要指责陪审团，先要批斗那些地方官，当一些重大的司法问题出现时，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地方官。比如最近的一个指控医

生的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糟糕至极的督察官竟然因为一位智力低下的女孩指控医生为了三十法郎而非法为她做手术，便起诉了医生。若不是犯了众怒，惊动了最高法院的院长，这位医生一定还在监狱里服刑呢。这位医生受到了同胞们的同情，由此可见，这一错误的案件是多么野蛮。实际上，那些地方官早就默认了这一弊端，但出于自我保护，他们仍然强力阻挠发布赦免令。在这些相类似的案件上，陪审团在自己不能做出判断的时候，往往咨询公诉人的建议，因为他们相信，训练有素的公诉人已经调查了整个案件，且收集了所有的证据。既然如此，那么谁才真正应该为错误负责呢？事实已经不用去争论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大力推行陪审制度，它是现在唯一由个人无法替代的群体类型。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够起到缓冲法律无情的一面。这种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从原则上说既不考虑也不承认特殊情况。所有的法官都是那样铁面无私，他们除了死记法律典章，还会有一点点的人情吗？他们对那些杀人抢劫犯，对那些因为贫穷、因为被抛弃而杀死自己亲生骨肉的柔弱女子会施以同样的惩罚。然而在陪审团面前，与抛妻弃子逍遥在外的流氓相比，对这位柔弱女子的量刑应该以慈悲之心宽大处理为妥。

在对身份团体的心理有了充分的了解，也对其他群体的心理有了明确的认识之后，在为一个错误的案件平反时，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应该去找陪审团，而不是去找那些可恶的地方官

员。从陪审团那里或许还有一丝重获清白的机会，而想要从后者那里得到清白，简直是天方夜谭。群体具有的权力会让人们产生畏惧之心，但是，某些身份团体所具有的权力却让人们不寒而栗。

第四章

选民群体

提要：选民群体的普遍特点/说服他们所采用的办法 / 候选人应当具有哪些素质：声望很有必要/大多数情况下，为什么工人、农民都选举自己行业以外的人/词语和套语对选民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 竞选演说具有哪些普遍性的特点/选民意见的形成过程/政治委员会有哪些权力 / 它们是最可怕的专制代表/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是怎样的/普选权虽有缺陷，但目前还不能废除/即使对选举权进行限制，对选举结果也不会有丝毫的影响。

选民群体，即具有选举某人担任某个职务的权力的群体，也是异质性群体的一种，但是选民群体所有的行为都只源于一件事情，那就是从多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合适的人担任某一职位，所以他们与前面所讲到的异质性群体的特征相比，要不同得多。在选民群体的特征中，他们表现出极少的理性，他们缺少批判的精神、很容易相信别人、很容易愤怒，而且思想简单。此外，他们所做出的决定完全是受群体领头人的影响以及断言、重复、传播的作用而产生的。

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些支配选民群体的方法。从这些最好的办法中，能够轻易地找到选民群体行动的理由。

第一，最为重要的是，候选人应该具有较大的声望。此外，具有超多的财富，能够取代个人声望。具有优秀的才能，甚至是天才，都只是成功的要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是，具有声望的候选人一定要让选民不经思考就投自己一票。为什么工人和农民很少选举他们的同业者担任某一职位呢？原因就是，他们的同行没有在群体中确立自己的声望。即便是偶然在自己的同行中选举了一个人，那也是因为其他并不重要的原因所致。比如选民们需要通过这个人报复某个权势很大的人或者是万恶的老板，又或者是以这种方式来满足他成为主人的幻想。

仅仅只有名望还不能够百分之百保证候选人能够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大多数时候，选民们很享受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欲望和对荣耀的强烈渴望。候选人必须做一些不靠谱的事情，吹一些不着边际的牛皮，做一些痴人说梦般的承诺，才能够得到选民的信任。

倘若选民的主体是工人阶级，那就要绞尽脑汁来对老板进行侮辱和语言攻击，攻击到任何程度都不为过。对于竞选的对手，就一定要充分使用重复、传播等方法，斩钉截铁地告诉选民，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恶棍，并且将对手妇孺皆知的“恶行”加以无限扩大后传播出去。专注于表面

的一些所谓证据是毫无用处的，假若对手对群体的心理一无所知，他就会竭力为自己辩护，而不会以断言来抵制来自对手的断言。这样一来，竞选对手就失去了取得竞选成功的可能性。

候选人所形成的文字性的竞选承诺不能过于肯定，否则在将来，他的对手会以此为据对其进行攻击。但是口头纲领，可以漫无边际地胡说海夸，可以大胆地对民众关心的事情许下承诺。这样做能起到非常大的效果，然而这种承诺并不会对将来形成制约的力量，未来的事情是需要进行长期观察的，没有哪个选民会吃饱了没事干，天天盯着获选人。选民对自己曾经支持的候选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到底能在某个职位上做出哪些成绩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或许当初正是因为候选人做出的某些夸张的纲领说服了自己。

通过上面的事情，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所有说服的因素在这里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我们通过对各种各样的口号和承诺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后还会发现它们。一个能够巧妙而熟练地运用这些手段的煽动者，仅仅用这一手段就能办成别人需要用武力才能解决的事情。比如不义之财、可恶的剥削者、值得尊敬的工人、资本家的财富平均化等一些陈旧且腐朽的说法，永远会在竞选中达到惊人的效果。此外，假如候选人能够用一些富有含义，又能够满足各种不同要求的新的词汇，他也肯定能在竞选中获得胜利。1873年发生在西班牙的那场血腥的革命，

便是因为这种含义复杂多变，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的神奇词语所引发的。一位当时的作家向我们说明了这种说法出现的过程，可以为我们所引用：

左派分子早就认为集权的共和国其实是君主制的变相，于是为了讨好这些左派分子，议会就搞出了一个“联邦共和国”，尽管所有的投票者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投这一票。然而这确实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深深地沉醉于其中，似乎一个幸福美满的世界就要在地球上出现一样。如果共和主义者的对手不认可他们的联邦主义者的身份，他们将会感觉受到了极大蔑视而愤怒不已。人们纷纷在大庭广众之下山呼：“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对这一制度的实施大加赞美，对解禁部队的纪律、解放士兵、士兵自治这些事情大肆宣扬，褒扬之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一个人都对“联邦共和国”这一体制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实行行政分权，各省分制；另外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将一切的权力消灭，即将迎来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分布在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支持人民公社权力至上的建议，他们认为应该在西班牙建成一万个互相独立的公社，并且按照公社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法律条文，并且废除警察和军队，解散警察和军队。暴动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南部各省蔓延，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一个村庄蔓延至另一个村庄。

有个村庄在宣布独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剪断了所有的电报线，炸毁了铁路，试图以此来断绝与周边地区和马德里的所有联系。而那些条件不好的村庄就只能合并到别的村庄当中，接受别人的领导了。联邦制给各地的独立提供了方便，到处都是呼天抢地，火光冲天，所有人内心中的魔性都得到释放，他们烧杀抢掠，罪恶滔天。疯狂、血腥、丑恶充斥着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要想真实地了解理性对选民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绝对不能去看那些报道选民机会的文章。在这种集会活动中，虚伪的表演、谩骂之声等野蛮充斥着每一个地方，有时甚至会彼此动起手来，武力相向，但是绝对不会有平和的讨论。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片刻的安静，那也是某个享有声望的“野人”在自以为是地宣称要用一些苛刻的问题让候选人难堪。当然，这种满足对于反对者来说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个“野人”的叫喊马上就会被对方更大分贝的声音压制下去。以下是从报纸上成百上千个相同的报道中摘录下来的典型的与选民聚会有关的报道：

当大会的其中一个组织者要求大会推选出一名主席时，全场立刻就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冲上了讲台，蛮横地站在了会议桌上，并与反抗的社会主义者

发生了冲突，他们扭打在一起，互相斥责对方是收到了政府好处的奸细……一位选民沮丧地离开了会场，他的眼眶都被打青了。

经过了喧嚣的打闹之后，会议只得延时，此时话筒被交给了X同志。

这位演讲人上台后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者的猛烈的指责和谩骂，而社会主义者则用“愚蠢”“恶棍”“流氓”等粗俗的语言予以回击，并试图打断这位演讲者。这位演讲者根据社会主义者回击的脏话总结了一个观点，并以此为据，宣称社会主义者都是“低能儿”或“小丑”。

.....

昨天晚上，人们在预备五一劳动节庆祝会，在福伯格官大街的商会大厅阿勒曼派开了一次以“安静，理性”为口号的会议。

人们纷纷使用G同志来暗指被他们称之为“白痴”和“骗子”的社会主义者。恶语一句六月寒，因为这些粗俗的脏话而引起的演讲者和选民互相谩骂或武力相向的事情时常发生。他们随手举起椅子、桌子、板凳互相殴打。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一定不要错误地认为，上面描述的事情只发生在那些无知而固执的、社会地位低下的选民群体身上。其实，无论在某一

种集会中，也无论参与者有多么高的学识和修养，一旦争论起来，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堪。前面已经讲过，聚集成群体，个人的智力水平统统会被群体的这种机制降低。不必怀疑，这种证明事例在任何一次聚会中都能找到。以下是1895年2月13日《材报》上关于一次集会报道文章的部分摘录：

那天晚上，夜越来越深，但是嘈杂却有增无减。每一个演讲者在台上都不能完整地说完两句话，往往一句话刚说完，就被反对者粗鲁地打断。个人或者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大声叫嚷。有时又突然掌声四起，有些人故意捣乱，嘘声四起，还伴着流氓哨。除了演讲者和反对者，选民之间也在相互争吵谩骂。甚至有些人握着木棍乱舞，还有一些人故意发出敲击地板的声音。当演说被打断后，人们便起哄，“把他轰下去！”与“让他说！”这两种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

C先生的演讲没有一句好话，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贯穿于他演讲的始终，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要让这些东西全部灭亡，让它们在地球上消失。

等等，这样的事情很多。

人们可能要问，在这样嘈杂不安的环境之下，选民们的意见怎么能达成一致呢？其实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问题，因为选

民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见，还谈什么达成一致呢？群体所赞成或反对的意见都是别人赋予他们的，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持有理性的观点。在选举这件事情上，选举委员会控制着所有选民的意见和选票数量，而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往往是由政客们组成，他们在工人阶级中很有声望，常常向工人和农民许下口头的承诺。如今最坚定的民主人士之一的谢乐先生曾经这样说过：“你知道选举委员会是什么吗？它构成了我们所有制度的基础，是政治机器生产出来的艺术品。选举委员会长期把控着选举，法国长期被它统治。”

只要群体接受了候选人，同时候选人又具有可观的财源，那么争取选民的投票就不是一件难事。根据捐款人透露，只要凑够三百万法郎，布朗热将军再次获选便是肯定的事情。

这就是关于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没有好坏之分，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

因此，从上面的事例来看，并没有找到反对普选的依据。我们知道了普选的命运如何，基于一些实际因素的考量，我不反对将这种选举办法继续执行下去。我们通过调查、分析群体心理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此，我们还需要对它做进一步的说明。

毫无疑问，普选的缺点非常明确，人们很容易就能看见。我们不必对文明的进步取决于少数智力超常的人这一事实产生

怀疑，他们处在一个金字塔的最顶端。然而随着金字塔下面的各个层次的逐渐拓展，即一个民族中的群众越来越多，智力超群就显得非常少了。一种文明的发展，倘若只能凭借那人数众多的普通人手中的选票，这怎么能让人们心安呢？还有一件很明确的事情是：群众投下选票后，往往是获得了一份危险。选民群体间接性让我们遭受了很多次的侵略，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在群体的支持下，社会主义获得选举的胜利。痴人说梦般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理论，百分之百地会让我们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代价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以上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在实践中却没有市场。因为我们不得不相信，普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种变成教条后的观念所具有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从哲学的角度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和宗教的教条一样脆弱，不堪一击，但是当它深入人心后却与曾经的教条一样，有着极强的力量，不可战胜，不可消灭。我们可以设想，当一个现代自由思想家穿越回了中世纪后，他会对在当时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力的宗教观念进行攻击吗？倘若他被能够决定他的生死的法官所掌控，宣称他是魔鬼和巫师的朋友，他还会反驳这种荒谬的迷信吗？用理性的推理方式来对抗野蛮与蒙昧，就和群体的信念一样，属于愚蠢的做法。今天的普选与过去的宗教一样具有十足的威慑力。演说家和作家对它顶礼膜拜，虔诚的程度比觐见路易十四还要过分。所

以，要想撼动普选这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只能寄希望于时间的力量了。

此外，想要去破坏这种教条也是徒劳的，因为它就像乌龟一样，有一层坚实的外壳保护自己。托克维尔曾明确指出，“在人人平等环境下，人们对那种人人生而平等，没有差别的说服持质疑的态度，但是这种巧妙的比喻却让他们非常信任群体的理性思维，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智力超群者，真理并不会因为数量优势而偏向于人多的一方。”

有人天真地认为：我们可以对选举权做出一些约束，倘若有必要，可以将这种权力收归到智力超群者手中，如此一来，选民投票的结果便会更加地合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观点，因为我说过，所有的群体都是低能儿，哪怕它的成员都是专家、教授也不例外。个人一旦投身群体，他们将会变得智力平常，在一般性问题上，由四十名教授投票与由四十个小商贩投票，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我永远也无法接受这种观点——让有教养的人和知识分子成为选民，如此，曾经饱受争议的普选结果就会明显改善。无论选民群体中的个人掌握了什么技术，或是受到了多高的教育，取得了什么成就，在群体中，他都不可能发挥他的智力水平，也不可能掌握社会问题。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在高等教育中脱颖而出，大多数是教授、学者，然而他们在贸易保护、双本位制

等一般性的问题上没有一次达成过一致的意见。原因在于，他们的学问只占有所有科学中非常小的部分。在解决社会的问题上，因为其本身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从而在本质上，高学历者与文盲并没有区别。

所以，即便所有的选民都由那些具有高深的学识和技能的人组成，由此获得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在的结果好到哪儿去。在群体中，群体的情感和意志依然会牢牢地支配着他们。对于那些我们还无法挣脱的难题，我们还没有想到好的方法予以解决，倘若我们真的要逆流而上，我们极有可能要被身份团体的暴政打压和迫害。

群众现在手中的选举权力，不管是只赋予某些精英分子还是给所有民众，也不管是实行共和制的政体还是其他政体，更不管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还是其他国家予以实施，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总而言之，它所追求的只是一个种族盲目的、毫无目的的需求。在任何一个国家，在竞选中获胜的人的普遍性意见都是一个种族特征的表达和反映，而且，这种天生的特征是不会有有多大改变的，不管经历了多少代人都没用。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不管在何时何地遇到何事，总是会和种族这个东西纠缠不清。由此，我们会得出另外一种观点，我们不必寄希望于政府及其制定的各项政策，因为这两种东西不会对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产生多大的作用。而对民族起到决定

性作用的是其种族性格，即受到某些品质性格所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的控制。而这些品质汇总后便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秉性之根本。对我们的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是种族，以及由我们生存之欲望所构成的沉重包袱。

第五章

议会

提要：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特征/他们意见的简单化/易受暗示，但有局限性/他们难以改变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议而不决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是议会的真正主人/演讲术的要点/没有威望者的演说会劳而无功/议会成员的情感夸张/国民公会的实例/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业人士在技术性问题上的作用/议会制度的优点和危险/适应现代要求，但会造成财政浪费和对自由的限制/结论。

我们在议会中找到了一个有称谓的异质性群体的例子。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千差万别，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它们都有着雷同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或者减弱或者强化了群体的相同特征，但不会妨碍它们的表现。大不相同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让各国政府面对着同样的窘境。

然而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即在某个问题上，多数人要比少数人更有可

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这种观念虽然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是错误的，但却能得到普遍的认同。

在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显著特征：头脑简单、思想跳跃、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因素。然而，由于其特殊的结构，也会有一些独特的现象，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所有政党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政党中，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原则因政党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非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加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思想。

议会有着特别质朴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典型。他们用教条主义和逻辑思维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糊不清的世俗观念，他们贯彻死板的原则，不关心事实如何。在涉及他们时，人们有理由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并没有看到这场革命。在引导他们的十分肤浅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种高度文明倒退到了原始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最终采取的办法，与极端野蛮的人有着相同的特性。基本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

们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不论他们是吉伦特派，还是山岳派、热月党，全都受到同样精神的鼓励。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而且就像所有集体一样，暗示都是来自于声名鹊起的政坛领袖。不过议会群体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固执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决心。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贵族选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上，即使有狄摩西尼^[1]的天赋，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倾向。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的暗示，足以压倒来自任何方面的一切负面性的建议，从而使意见的绝对执行得到了维护。

一旦涉及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就不再有固定式意见了，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虽然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略有不同。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处于伯仲之间。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势力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这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其在一刻钟之内会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法案。

由于同样的原因，每届议会肯定会有一些稳定的议案和一

[1] 狄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演说家和雄辩家，希腊联军统帅。

些易变的议案。全面来看，一般性问题的数量会更多一些，于是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便稀松平常，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忧。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有可能影响决策者的影响力。

不过，在辩论中，当涉及的问题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见之明时，处于主导地位的人依然会是那些政客领袖。

这些领袖的权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政坛领袖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人没了首领便一事无成，因此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

领袖的影响程度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声。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颜面尽失，那么他们的影响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这些政治领袖的威望只属于他们自己，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西蒙先生^[1]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成员之一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路易·拿破仑两个月以前还无所不能，如今却完全无关痛痒了。

[1] 西蒙（Jules Simon, 1814—1896），法国政治家、激进思想理论家，两度当选议员，1876年担任总理。

维克多·雨果登上了讲台。他无功而返。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皮阿^[1]说话一样，但是他并没有赢得台下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那些幼稚的想法，”谈到皮阿，沃拉贝勒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基内^[2]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群，却一点也不受人爱戴。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默默无闻。

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于天时地利之外，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诡辩，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民族有利。若想拥有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会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引用这些话，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些现象，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贫乏得很。群体一旦效忠，无论效忠党派领袖还是国家领袖，它便马上会丧失自己的原则。服从领袖的群体往往会置身于领袖自身的影响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控制。

因此，拥有显赫威望的政坛领袖几乎掌握国家的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多年时间里因其威望而拥有绝对影响

[1] 皮阿（Felix Pyat，1810—1889），法国记者，激进思想者，1848年进入议会，1871年再度当选议员，同年进入巴黎公社。

[2] 基内（Edgar Quinet，1803—1875），19世纪法国重要思想家，1871年入选议会。

力，但在上次大选中因为经济问题而落败，此事鲜为人知。他只用做个手势，内阁便会倒台。有个作家用下面一席话阐述了他的影响力：

一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付出更多的代价，主要是因为他，让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形势日益危急，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我们失去了对埃及的控制。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在滑铁卢的灾难更为严重。

对于这样的领袖，我们不必太过于苛责。是的，他使我们损失惨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因为他顺应人民的意愿，而这种所谓的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至少目前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强奸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它，因此也会滋生其中的全部错误。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威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现象。统治者如果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他必须了解群体心理，至少也要无意识地掌握这一点；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向他们说话。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套话、词汇和形象的奇妙力量。他应当具备诡辩的才能，这包括言之凿凿、卸去证明的重负，生动的形象，并伴之以非常模糊的论证。这种诡辩在所有集会中都可以看到，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虽然它是所有议会中最严肃的一家。

英国学者梅因^[1]说：在同下院的争吵中可以看到，整个辩论过程不过是些软弱无力的谎话和暴躁的个人之间的对决。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模糊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得到过证实，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证实。

上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重重要也不能算过分。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选择上，必须以能够唤起生动的形象为准。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

这艘船将驶向坐落着我们监狱的那片黑热病肆虐的土地，把声名狼藉的政客和目无政府的杀人犯关在一起。这对难兄难弟可以促膝谈心，彼此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中互惠互利的两派。

如此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演讲者的所有对手都会觉得自己受着它的威胁。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在一个黑热病肆虐的国度，可以把他们送到安全之地的一艘船。他们很可能被放在那些定义不明确的可怖政客中，他们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威胁的演说给国民公会的人所造成的感觉是一样的。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他们肯定会向他

[1] 梅因（Henry Maine, 1822—1888），英国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古代法》《早期制度史》等。

投降。

啰唆地说些最离谱的大话，永远对统治者有利。对于刚才引用过其讲话的那位演说家来说，我们可以断言，其并不会受到强烈抗议，经济学家和传教士在资助扔臭鸡蛋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总裁也应受到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严厉对待。这种断言永远会在人群中发挥出巨大作用。再激烈的言辞、再可怕的声明也不过分。要想吓唬住群众，没有比这种欺骗更有效的办法了。在场的人会担心，假如他们表示抗议，他们也会被当作叛徒或其同伙打倒。

正如我所讲，这种独特的辩论在所有的聚会中都极为有用，关键时刻它的作用会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那些大演说家的演讲，听起来都十分滑稽。他们无时无刻不认为自己必须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再对暴君一顿破口大骂，发誓为了自由宁愿舍去生命。听众们被热情感染，站起来热烈鼓掌，冷静下来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有时也有货真价实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领袖，可是具备这种品质通常对其来说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证明事情有多么糟糕，欣然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商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减少信徒们所必需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民众领袖的思想之狭隘令人震惊，可是影响力最大的，也一定是思想最偏狭的人。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罗伯斯庇尔的演说，时常会有着令人吃

惊的前后矛盾，如果只听这些演说，我们会实在搞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教学法式的废话，糊弄孩子头脑的拉丁文化，攻击和辩护所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对付小学生的歪理邪说。没有思想，没有令人愉快的措辞改变，也没有切中要害的嘲讽，只有令我们生厌的谎言。在经历过一次这种毫无阅读快感的阅读以后，人们不免会与和蔼的德穆兰^[1]一起，叹息一声：“唉！”

想到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结合在一起的信念能够给予一个有威望的人怎样的权力，有时真让人毛骨悚然。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阻碍，表现出极强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基本的条件。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且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着自己的偶像，他们永远需要这种领袖人物。

在议会里，一次演说如果要取得巨大成功，绝对和演讲者提出的论证无关，而是完全依赖他所具有的威望。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讲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威望，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力，即他根据自身的意志来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讲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的演讲稿时，如果他只有论证，他最多也只能让大家听一听。一位有心理学

[1] 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演说家。

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威望的众议员：

他走上讲台，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事先经过充分准备的讲稿，有模有样地摆在面前，自信地开始发言。

他自我吹嘘，能够让听众确信让他本人振奋的事情。他总是重复自己的论证，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面对他所引用的证据，任何反对都没用处。他自我陶醉地演讲着，他相信自己同僚的眼光，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只会赞同自己所谓的真理。

然而他一开口便惊异地发现大厅里并不安静，人们发出的噪音让他多少有些恼怒。

怎么不能保持安静？为何这么不关心他的演讲呢？对于正在讲话的人，那些众议员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这个或那个众议员离开自己的座位呢？

他脸上开始浮现不安的神色。他皱着眉头停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扯开嗓门开始演讲，他加重语气，并做出各种手势。可是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将自己的声音淹没。于是他又停了下来。最后，因为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可怕的叫喊：“闭嘴！”便又继续开始演说。

当议会极度狂热时，它也会变得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什

么两样，这时它的感情就会表现出总爱走极端的情况。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错误。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会完全丧失自我，且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阐述了议会能够多么愚蠢地丧失自我意识，居然被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截然对立的意见牵着鼻子走。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便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但是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竟然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议会成员放弃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便使自己永远处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而他们却还是迈出了错误的一步。他们并不害怕在自己的阶层里滥杀无辜，哪怕他们心里很清楚今天他们把自己的同伴送上断头台，有可能这就是他们自己明天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我曾讲过的一个完全不自主地受到控制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赞成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意见。下面的话摘自他们中间的一位，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这段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其实一直极力谴责自己的决定，”他说，“两天前甚至一天前我们还不想做出的决定，居然就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危机，再无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正确的说法。

在所有情绪激动的议会上，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无意识现象。泰纳说：

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一些令他们骄傲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愚蠢透顶，简直就是犯罪、滥杀无辜，杀害自己的同伴。在右派的支持下，左派全体一致，在热烈掌声中把丹东，他们的领袖，这场伟大革命的发动者，送上了断头台。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全部一致，在最响亮的掌声中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议会全体一致，在一片热烈叫喊的赞扬声中，在对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热烈的赞扬声里，一再举行改选，将杀人成性的政府留在台上。平民派憎恶它，是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是因为这个政府草菅人命。平民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落了个同意为他们的相煎太急而出力的下场。牧月22日，整个议会把自己交到刽子手手里；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发言后的一刻钟内，这个议会又批准了同样的事情。

这幅画面看起来愚不可及，但它表达得却十分准确。议会若是兴奋和头脑发热到这个程度，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它会变成不稳定的政体，会受到一切外来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下面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一位有着无可置疑的民主信仰的议员。我把《文学报》上这段十分有代表性的文字转引如下。它为我曾经说过的夸张感情这一群体特点，为它的极端多变性（即使它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提供了一段例证。

共和派因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猜忌，也因为它的盲信和无节制的愿望而坠入深渊。它的质朴和天真与它的普遍怀疑不相上下。与毫无法律意识、不知纪律为何物的表现相始终的，是肆虐的恐怖和幻想。在这些方面，农村人和孩子也比他们强。他们的冷酷和他们所缺乏的耐心一样严重，他们的残暴与驯顺不相上下。这种状态是性格不成熟以及缺乏教养的显著结果。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这种人吃惊，但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出于恐惧或出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既能慷慨赴义，也会抱头鼠窜。

他们不管什么原因和后果，不在乎事物之间的联系。他们时而垂头丧气，时而斗志昂扬，他们很容易受恐慌情绪的左右，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从来不会处在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中。他们比流水还易变，头脑混乱，行为无常。能指望这样的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

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依旧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其实，这些法律的作者都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拟订草稿的，由此，通过表决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法律。这些法律自

然就是最好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它们才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群体的产物无论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物相比，总是品质低劣。专业人士阻挠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专业人士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不能影响他，他却可以影响议会。

议会的运作虽然面对所有这些困难，但它依旧是人类迄今为止在管理实践中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摆脱独裁专制的最好方法。无论是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来说，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机构。

然而，在现实中它们也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首先出现的危险是各种紧急情况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假如有位议员提出一项符合民主理念的议案，譬如，他在议案中建议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金，或建议为所有级别的国家公务员加薪，其他众议员因为害怕自己的选民，就会成为这一提案的牺牲品，他们不敢无视后者的权益而反对这种议案。虽然他们心里清楚这是在为财政预算增加负担，必然造成新税的开征，但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犹豫不决。增加开支的后果由遥远的未来承担，暂时不会给他们自己的利益带来任何不便，但是如果现在反对，会为日后当选或连任产生巨大的阻碍。

除了这个增加财政开支的议案，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议案，即必须投票赞成地方用途的补助金。一名众议员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金，因为它们同样反映了民众最迫切的需要，也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自己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机会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权益。

上面所提到的另一个危险，即议会对自由绝对的限制，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却是十分真实的。这是大量的法律（它们总是一种限制性举措）所造成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目光短浅，导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结果无从所知。

这种危险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且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没有逃脱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很久以前的书中就曾讲过，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他在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又谈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自从这个世纪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迅速膨胀的独裁政治不停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有许多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自由的事情进行了限制，强迫他们做一些以往他们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同时，日益严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区性的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以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们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

花销的份额，进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这种对个人自由加剧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有斯宾塞没有清晰指出的各种明确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立法举措，大体上全是些限制性法律的实行，必然会大大增加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主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在政府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影响，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永久地存在，而实行压迫性的专制的人，就是具备了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停地制定一些限制性法律，用最复杂的教条把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肯定会把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地限制起来。各国被一种谬见所欺骗，即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限制，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隶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的主见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是消极、服从、无意识的行尸走肉。

若是这样，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的各个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绝望同步增长。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和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中。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

以持久，也不会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他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有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时期到来的原因。

根据历史的教训以及骇人听闻的那些事实，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的、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所有的民族似乎都无法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境况，因为看起来历史依然在不断地重复着它的轮回。

关于文明进化的这些相同阶段，很容易做个简单的解释，我将对它们做一概括，以此为本书结尾。这种速记式的说明，也许能够对理解目前群众所掌握的权力的原因有所启示。

假如我们根据主要线索，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与衰败的原因加以评论，会发现什么呢？

在文明的诞生之初，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而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尽相同。使这些人结为整体的唯一共同的原因，是没有完全得到某个领袖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不堪的集体有着非常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有短暂的团结，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许多弱点，易冲动且性情狂躁。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就是野蛮人。

漫漫的岁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环境的一致、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会产生独特的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逐渐融合成一个新的种族——一个有着共同性格和感情的种族，它们在通婚作用下，变成了一个稳固的民族，这个民族又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形态下的崇拜——无论是雅典诸神还是真主安拉，都足以让每个人在思想感情上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统一。

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就此诞生。这个种族在追求自己理想和奋斗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绩所必不可缺的素质。不用怀疑，它可能依旧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它捉摸不定的特征的背后，会逐渐稳定起来，这就是一个种族的禀性，它决定着一个种族在局限的范围内变化，并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其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还是人，永远逃不出它的魔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之后，它便会停滞不前，而一旦停滞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盛极而衰。

这个盛极而衰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衰弱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来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土崩瓦解。

随着这个种族的凝聚力开始不断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强盛的光辉。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种族

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代替，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减弱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就是同一种族、同一共同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乌合之众，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只是因为传统和制度等因素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焦头烂额的人，已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最细微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丢失，这个种族的锋芒也完全消失。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人，就此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了未来，只有乌合之众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彻底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只有随波逐流。人民就是最高的权力，野蛮之气盛行。文明也许依旧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了它华丽的外表，然而它已成为一座危如累卵的大厦，没有任何依靠，下次风暴来临，它便会立刻土崩瓦解。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到文明，之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了应有的光芒时，它便走向没落及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圈。